

社會資本與公民意識： 世代差異的比較*

王光旭、蔡子弘**

《摘要》

本研究從網絡途徑社會資本理論的觀點出發，討論社會資本與公民意識的關連性，並兼論世代之間的差異，非但與西方 Putnam 團體格局的社會資本論述有差距，也有助於理解華人社會意涵下，社會資本對公民意識的影響。本研究發現：（1）個人社會資本對公民意識有正向顯著影響；（2）第一世代的社會資本與公民意識相較於其他世代低；（3）第四世代公民意識普遍較高，但在高社會資本的狀況下，第一代民眾在公民意識提升較為明顯。本研究為公民意識的形塑與發展，提供一個與 Putnam 不同的解釋基礎，期望能為臺灣社會公民意識的發展提供新的研究與思維方向。

[關鍵詞]：公民意識、社會資本、定位法、社會網絡、世代差異

投稿日期：110年7月1日；接受刊登日期：111年9月25日。

* 本論文初稿曾發表於2019年5月4與5日在東海大學所舉辦之臺灣公共行政與公共事務系所聯合會（TASPAA）國際學術研討會。本文為科技部（現為國科會）計畫（MOST 105-2628-H-024-001-SS2）部份資料分析之研究成果，在此感謝科技部（國科會）的經費支持，也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的寶貴意見，然文責仍由作者自負。

** 王光旭為國立臺南大學行政管理學系教授，e-mail: gxwang@gm2.nutn.edu.tw。

蔡子弘為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碩士生，e-mail: 108256002@nccu.edu.tw。

壹、前言

近年來，一連串的社會問題，如太陽花學運、同性戀與同婚議題等，激發臺灣民眾-尤其年輕人的政治熱情，「自己的國家自己救」等政治口號如雨後春筍般出現，人民的公民意識抬頭，熱切地討論政治議題，關心並監督政府的施政，而有關公民參與和「公民意識」(citizenship)的研究，也成為政治學門的顯學。從歷史經驗與學術成果來說，民主政治的成功則有賴公民的積極參與，然而一個國家若缺乏社會性的共同意識，自然也就無法在其成員中孕育出公民意識，更遑論積極參與公共事務。沒有國家社會的公民意識，這個社會即無法建立公民道德與公民倫理的價值體系，社會本身就不能自主地經由民主意識來自我制約，以維持社會秩序，提升生活品質(陳其南，1992：8)。從定義上來說，公民意識是民眾願意為了公共利益而主動參與的認知，並且可以明確知道自己的權利、義務以及社會責任，基於這樣的認知而產生社會整體的共同意識，並決定了公民參與公共事務的行動(郭秋永，2009)；進言之，公民意識是提昇公民公共事務參與素質以及民主品質的關鍵，在日漸邁向民主穩固的臺灣社會尤為重要。然而，促使一個人對政府公共事務關心、對政治投入背後有諸多影響因素，從過去的研究文獻中，大致可將影響因素區分為個人社會人口學背景，以及心理層次等因素，前者包括性別、年齡、教育程度、社經地位、社團參與等等；後者則是指涉政治信任、政治效能感、政黨認同、公民意識等(林瓊珠，2016)。

傳統研究多探討政治參與跟公民意識、公民參與行為與公民意識、投票行為與公民意識等關連性，也多將公民意識當作是公民參與的自變數，檢視公民意識對政治行為的影響(陳光輝，2010；莊文忠，2010)，較少將其當作依變數來討論，瞭解哪些因素會影響公民意識的高低。另外，以顧忠華(2004)的研究為例，其認為臺灣當前的社會已具有相當程度的「現代性」，然「傳統社會」文化的因子卻仍深植於我們的社會之中，重視人際交往與社會關係的文化，對臺灣社會仍舊有著重大影響。陳其南(1992：8-10)也指出，中國式的社會在邁入現代國家和現代社會型態的過程中，最嚴重的問題恐怕是「公民」理念的缺乏，而這個缺乏與傳統文化有一定的關聯性。其認為臺灣社會的構成，基本型態仍以「私民」理念為核心。「私民」與「公民」乃是相對的概念，「私民」以其個人的私慾和利益，及其個人身份衍生的人際關係(如家屬、親友及同僚等等)，作為行事法則和處事前提，顯示臺

灣的公民意識的發展可能受到其個人人際交往的影響。

自從 Putnam (1993) 透過對義大利的社會資本研究，討論社團參與所營造的社會資本對社會信任與公民參與的作用，社會資本研究便開始在政治學有關公民社會的領域扮演重要角色，臺灣的政治學界也有不少的研究成果，聚焦討論社團參與及政治參與間的關連性（林聰吉、楊湘齡，2008；張芳華，2016）。然而熊瑞梅（2014）對亞洲國家的社會資本和社會信任的研究成果顯示，臺灣民眾對社團的參與並不熱衷，其社會參與模式並不像 Putnam (1993, 2000) 所言類似西方的團體參與，反而在個人層次異質性的社會資本非常熱絡。換言之，臺灣民眾在社會互動上，人際關係格局的互動更勝於團體結社格局的互動，但以個人關係和資源動員能力為核心的社會資本，在臺灣的社會脈絡中卻鮮少與公民意識一起討論，這不禁讓吾人思考，或許可以從強調個人互動層次 Nan Lin「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 的觀點切入，從個人關係與資源動員的角度出發，來探討個人社會資本與公民意識間的關連性。而臺灣公民意識與公民社會的發展，和 Putnam (1993) 所強調的團體結社格局與公共事務參與的模式究竟有何差異，也沒有被進一步的深究。

進言之，從社會文化的脈絡性來說，在強調華人關係文化的臺灣社會，團體結社和網絡動員間的關係對民主政治發展的影響，一直以來都是一個很模糊的地帶。因此，稍微跳脫出 Putnam (1993, 2000) 團體結社對民主政治正向發展的角度，從個人社會資本的觀點討論公民意識與政治行為，在臺灣的社會文化脈絡中有其意義。故本文嘗試以網絡途徑的社會資本理論為出發點 (Lin, 2011ab, 2008)，作為公民意識的討論基礎，以求形成日後理解臺灣公民意識強弱的一個觀點。

本研究另外一個探討的核心，是公民意識是否有世代差異的問題，是否也受到其個人社會資本差異的影響？2013 年一連串的公民運動，臺灣公民社會似乎呈現更加積極參與臺灣政治社會改革的浪潮，其中特別是「年輕人公民意識崛起」，儼然成為臺灣政壇上各種重大事件的重要因素之一。在許多的世代差異研究文獻都指出，不同世代在歷經不同重大政治及社會事件影響下，將導致政治態度與參與的差異，臺灣的民意調查在不同年齡層中，往往容易看出年齡層間對政治態度上的差異，而政治態度也是公民意識中重要的一環。可想而知，世代的差異可能也會與公民意識的高低有所關連，因此在討論社會資本與公民意識時，本研究也將同時討論年齡層的差異可能造成的影響。

貳、文獻檢閱

一、社會資本

社會資本的基本概念與論述至少可以追溯至 Homans (1961) 的社會交換理論 (引自 Astone, Nathanson, Schoen, & Kim, 1991: 11)。一般常以 Bourdieu (1986)、Coleman (1988, 1990) 及 Putnam (1993) 所提出的概念作為代表及討論的開始 (謝秉錡, 2011)。Bourdieu (1986: 248) 認為經濟資本、文化資本、社會資本彼此之間可以互換, 社會資本是某種實際或潛在資源的總量, 是由社會義務或聯繫所組成, 這些資源彼此認可、具有制度化關係的網絡、也與團體成員身分連結。此外, 社會資本透過社會網絡或團體成員之間的聯繫, 不但可以被個別成員所運用, 也可以強化彼此間的信任關係, 成為集體共享的資產 (Bourdieu, 1986, 1993, 1997)。對於 Coleman (1990) 而言, 社會資本包含兩個部分: 社會資本為某種社會結構, 社會資本也有助於處於結構之內的個人特定行為, 特別是將網絡的連結視為是一種體現在自身效益的社會資源, 傳統的封閉網絡容易讓網絡內的成員彼此間有較為緊密的關係, 進而產生網絡內部的義務與認同感。

Putnam (1993) 則把社會資本定義為「能夠藉由促進協調的行動來改善社會效率之社會組織的特性, 例如: 規範、信任與網絡」。Putnam (1993, 1995, 2000) 與前述觀點不太一樣的地方, 在於他擴張了社會資本適用的範圍與概念, 不再將社會資本視為個人所特定擁有的資源, 而是一種集體的公共財, 並將其引進政治學的研究領域之中 (謝秉錡, 2011), 所關注的是社會資本對集體行動與深化民主的正面影響, 其所蘊含的集體性社會資本能制約成員的行動, 促使成員們採取具有公共性的行動。Putnam (1993, 1995, 2000) 所述集體面向的社會資本著重的是社會網絡中的連結, 規範、制度與組織化的參與行動, 可以促進內部成員彼此的信任與合作, 並促進集體的公益, 促使成員合作來達成集體目標。相較於另一個面向測量的是社會資本的品質, 彼此之間的信任及規範, 以及資源動員的效果。

因觀察角度差異, 社會資本的概念及定義十分多元, 若從個人功利性的角度來說, 社會資本意指對於社會關係的投資, 並期望藉此在關係中獲得回報, 這樣概略性的定義與許多對此領域頗有貢獻的學者所提出的詮釋一致 (Bourdieu, 1980, 1986; Lin, 1982, 1995; Coleman, 1988, 1990; Flap, 1991, 1994; Burt, 1992; Putnam, 1993, 1995;

Erickson, 1995, 1996; Portes, 1998；林祐聖、葉欣怡 譯，2005）。Lin（1982）指出社會資本可以被操作性地界定為鑲嵌於社會網絡，並被行動者為了其行動所需而獲得與使用的資源；換言之，個人的社會資本乃鑲嵌於社會網絡中，並且有助於其行動的資源。理論上，社會資本還可分成「觸及社會資本」（accessed social capital）和「動員社會資本」（mobilized social capital）兩種類型：觸及社會資本所指個人所能透過其自身的網絡連結直接觸及到的資源；動員社會資本指的則是「聯繫資源」（contact resources），特別指涉的是個人所能動用到「介紹人」的資源，許多實證研究都指出，觸及社會資本和動員社會資本對於個人地位取得有正面的影響（Lin, 1999, 2001a, b, 2008; Lai, Lin, & Leung, 1998; Lin & Erickson, 2008）。動員的社會資本牽涉到介紹人的轉介因素，較常被應用在謀職或勞力市場的研究領域，不是本研究所欲探討的面向，本研究所討論的社會資本專指觸及的社會資本。

觸及社會資本的操作定義及概念測量有不同的主張和作法，常見的測量方法主要可分為「定名法」（name generator）和「定位法」（position generator）。定名法發展於 1970 年代，從事人際網絡、社區研究、社會支持研究的學者，在研究操作上以受訪者的朋友或特定交往對象（如借貸、休閒網絡等），測量其關係網絡資源（Laumann, 1973; Fischer, 1982; Fischer & Shavit, 1995；林南、陳志柔、傅仰止，2010），特別是詢問受訪者最近跟那些人商量重要的事情，並追問與其關係品質，及對方的背景特質。這樣的測量方式可以呈現個人核心網絡的特質，也就是強連帶關係的型態，卻難免流於主觀，反而忽略了客觀的比較。

定位法的測量方式為事先設計好一組職業（或資源），從職業地位的高低，由上至下等距挑選，並做成測量的指標，測量受訪者所能接觸到甚麼地位的人，這些職位的類別主要是配合「國際職業分類」（International Standard Classification of Occupation，以下簡稱 ISCO）的職業分類與「國際職業聲望量表」（Standard International Occupational Prestige Scale，以下簡稱 SIOPS）職業聲望分數來施測。另外，Lin、Fu 和 Hsung（2001）使用 1997 年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Taiwan Social Change Survey）的資料進行分析，探討觸及社會資本對於個人地位取得的效應，採用的是定位法（position generator）的測量方式，根據問卷中所列出的 15 種職業的名單，依序回答有沒有認識從事這些職業的人，搭配轉換 SIOPS，分別計算「廣泛性」（extensity）、「達高性」（upper reachability）和「異質性」（heterogeneity）等三項網絡資源指標，並且以因素分析將這三項網絡資源指標合成社會資本的因子進行分析。

根據文獻的探討，政治學討論的社會資本大多專注在總體層次社會資本對於公民社會建構的影響；而個體層次的社會資本探討的多是對於個人社會地位的取得或是社會關係互動的研究，偏向社會學的思維，本研究基於對臺灣社會公民意識發展與華人關係文化的關懷，以個體層次社會資本理論的視野，希望能從個人所能獲取的網絡資源角度切入，瞭解社會上不同關係資源條件的人們，對於公民意識的影響效果，提供更具在地脈絡性的詮釋。

二、公民意識的內涵與演變

公民是指一個國家或政治群體的成員，與其他所有公民享有平等的權利與責任（Macfoy, 2014），而公民意識的高低攸關公民社會與民主政治的發展，故對公民意識的分析是政治學的核心議題之一。綜合有關公民意識的討論，可歸納為兩個層面：一是規範理論層面，強調個人與國家的關係、公民在當代社會中所應具備的特質，還有有關公民資格認定，包括權利主張與義務要求；二是實然經驗層面，透過各種測量工具，進一步探討公民在政治、社會、經濟等面向的價值觀、態度及實際行為模式，並評估其行為對社會的影響（Pattie, Seyd, & Whiteley, 2004；郭秋永，2009；莊文忠，2010；林瓊珠，2016；徐明莉、莊文忠，2020；Bloemraad, 2018）。根據郭秋永（2009）的整理，光是 citizenship 的中文翻譯，至少就有「公民資格」、「公民身分」、「公民地位」、「公民權」、「公民權責」、「公民意識」或「公民德行之實踐」數種，可以看出，citizenship 在政治與學術上的興趣有所增加，其所包含的意義也有所擴大，變得越來越複雜（Isin & Turner, 2002; van der Heijden, 2014），學界對於 citizenship 意義也尚有歧見。本研究暫將 citizenship 譯為「公民意識」，指涉的是作為「公民」（citizen）的各種表徵，以描繪公民的整體形象。

公民意識的探討跟「公民資格」（或譯「公民權」、「公民身分」）密不可分，對於公民意識的認識，需建立在對公民資格之意義及特質的瞭解（陳其南，1992；游欣儀，2004；蕭揚基，2004；郭秋永，2009；莊文忠，2010；林信志，2016；徐明莉、莊文忠，2020；Doheny, 2007; Isin & Turner, 2007）。首先，西方公民（citizen）的概念最早於古希臘時代建立起來，這種小規模的政治體，公民便於直接管理自身事務，參與政治的程度高，但是公民資格卻是有階級差異的。Plato 將這個時期的公民資格分為三個階級：統治者、保衛者和生產者，不同階級的人各有其道德規範；Aristotle 亦從階級觀點界定公民身分，係指「享有司法及公職的

人」，但將勞工排除在公民之外，因其不具公民的德性和尊嚴（莊文忠，2010）。

而後隨著民族國家的興起，公民資格的意涵也轉變為相對於國家角色而言，作為一個公民，不單單享有國家的保護與參與政治的權力，也開始強調公民應擔負的義務，如守法、納稅、服兵役等。這時期以 J. Locke 和 J. J. Rousseau 為代表，從自然權利論及社會契約論的觀點說明人民與國家之間的關係（林信志，2016）。陳其南（1992）則認為經由公民觀念建立共同意識，一定要靠某種東西把個體公民與社會整體聯繫起來，這個抽象的聯繫基礎就是「契約」。莊文忠（2010）認為，人民效忠這個國家的原因，在於國家可以保護個人的自然權利（如生命權、財產權、自由權等），當國家喪失此一功能時，人民有權終止政治權力的委託，創建新的國家。相較於前一個時期，公民資格不具排他性，只要滿足法律消極條件，不論是否擁有財產，皆為合格公民（林火旺，1998）。晚近，在十八世紀後，公民資格則有了更加積極的意義，法律積極創造個人自由，打破社會、經濟上的不平等，每一公民皆有平等參與政治的權利，公民資格也因婦女參政、經濟社會平等、民權運動更豐富其內涵（蕭揚基，2004：45）。此時公民資格不僅限於法律上的地位，也決定社會經濟與文化的分配，公民意識被賦予了更多社會性意涵。

除了公民資格的討論，Stokke（2017）在以理論為導向的文章中，試圖討論公民意識的含意，除了前述所提及的公民資格以外，他認為廣泛的公民意識還與文化、法律、社會、政治排斥或包容等概念有所關聯，他從公民資格、法律地位、公民權與公民參與等四個方面來確認公民意識的實質意涵。而蕭揚基（2000）認為：公民意識是一種建構概念，可以定義為以公民身分取得為基礎，其日常活動與行為除了自身利益考量外，也能積極善盡公共事務的公民責任與公民倫理，所以公民意識包含了公民認知、公民態度與公民參與三個層面，簡單來說，是個人知覺到自己作為一個公民角色的意識。在 21 世紀以來，政治學者對於公民意識的重新關注有許多原因，在理論層面，其整合「正義」（justice）和社群成員的呼籲，意即公民身分一方面須與個人權利有所連結，另一方面又必須顧及共同社群對成員的要求，這正是有關公民權在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之間的辯論。此外，有學者提及，現代民主的穩定不僅取決於其政治結構的穩定，更取決於公民的素質與態度：例如公民的認同感、政治容忍程度；以及對政治當局進行課責的意願，沒有具備這些素質的公民，民主的體制便難以維持（Kymlicka & Norman, 1994）。

相較於西方公民意識的發展是肇因於經濟發展而對於資本主義反動，在基本人權的基礎下，特別關心環境保障、工作保障及社會福利保障等權利，我國因為政治

發展的經驗有所不同，多將公民意識定義在對政治權威的批判、反思與對政治意見修正（莊文忠，2010；郭秋永，2009；陳光輝，2010；黃靖麟，2010）。郭秋永（2009）檢視許多以 citizenship 為研究主題的規範性與實證性研究，認為既有研究中觸及 citizenship 概念內容十分龐雜，包含了許多的權利、義務、德行與行為。當研究者使用這樣一個涵蓋廣大範圍的概念時，常遭遇不同的困境。例如，以權利與義務進行定義，絕大部分並無法準確區辨是「公民特有」或「國民共有」的權利義務；以德行為概念內容則包含各樣的優良德行，不論是「公民」、「子民」、「臣民」或「皇民」均可適用，無法突顯出民主社會中「公民」的特殊性。所以郭秋永認為 citizenship 有別於「子民」或「臣民」的一個關鍵，就在於民主政體下的「公民」乃是積極而主動，會公開表達本身政治意見、並藉由互動不斷的修正；也會面對權威當局，去質疑政策的好壞，並試圖影響結果。

簡言之，主動關心並實際參與公眾事務的意願便是公民意識的重要內涵，所以郭秋永（2009）特別定義出公民意識即：「公民監督選任的官員並判斷其政策良窳的一種意願，這種意願包含了公開質疑權威、公開表達政治意見、包容其他政治意見、修正本身政治意見的意願」。本研究對於公民意識的定義與測量採用郭秋永（2009）的觀點，因其操作化測量簡潔且具有穩定性（莊文忠，2010；陳光輝，2010；林瓊珠，2016；徐明莉、莊文忠，2020）。

三、社會資本與公民意識關聯性之推論

在 Putnam 開啟社會資本在政治領域的研究後，使得社會資本有不同面向的關懷，尤其是將社會資本從對個人層次作用的提升，拉高至整體社會甚至於國家層次的討論，探討的是集體行為對於民主發展的影響。尤其在 Putnam（1993）透過對義大利的研究，也強調了集體的社會資本對於促進社會信任以及公民參與的正向功能，說明社會資本在公民社會以及民主發展面向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而總體的社會資本在政治學領域對於公民意識的討論，多在於集體互動的產出，以及對社會信任、集體意識形成的影響。操作的方法也較多以社團參與、志願結社、社區參與等來測量總體社會資本含量，並以此來延伸討論總體層次的社會資本對於民主發展、公民事務參與、社會信任的影響，這樣的風潮也影響了臺灣政治學界社會資本與公民社會的研究議題與風向（林聰吉、楊湘齡，2008；張芳華，2016）。

從熊瑞梅（2014）對亞洲國家的社會資本和社會信任的研究成果顯示，臺灣民眾對社團的參與並不熱衷，其社會參與模式並不像 Putnam（1993, 2000）所言類似

西方的團體參與，所以想要從社團參與來解釋臺灣民主鞏固或民主運作的邏輯，可能會有臺灣無法出現公民社會或民主政治的結論；同樣熊瑞梅（2014）依據「東亞社會資本調查」（East Asia Social Capital Survey, EASCS）的資料，解析臺灣民眾日常生活每天接觸的社會資源量多（每天有接觸的人數較多），且關係多屬異質性的個人，社會資本會特別豐富。換言之，臺灣民眾的社會資本與社會參與的型態，並不一定是如西方社會一樣集中在結社與社團的參與，而是體現在日常生活中異質性的人與人間接觸的數量與密度，所以臺灣的政治動員中，也往往有人情網絡動員的現象。就東亞社會資本跨國研究案的結果，可以發現臺灣的社會參與和關係是更接近個人的關係格局，而非是團體格局（熊瑞梅，2014），個人所能接觸與使用的網絡資源多寡以及種類的不同，是否同樣具有影響公民意識的形成、參與公共事務意願的正向作用，或者是否能有效促進公民社會的建構？則是在考量臺灣社會的現實狀態後，我們所欲解釋的核心議題。

從研究的層次來說，國內討論社會資本與公民社會的文獻，鮮少以個體層次的社會資本進行討論。為何社會資本與公民社會產生聯繫？從個人資源途徑來看，國外文獻以個人社交與社經地位來解釋現代民主的發展，高社經地位者因其不用為了三餐溫飽的問題而煩惱，相較於低社經地位者，有較多可用的自由時間，增加了與他人交往甚至組成社團的意願，以積累個人社會資本（Foschi & Lauriola, 2014），並在這樣的基礎之下，有更多參與公共事務的機會與意願。Rosenstone 與 Hansen（1993）認為促進公民參與的力量可以分成個體、團體、以及動員三個層次；在個體層面，因為參與公共事務是有成本的，而這個成本有金錢、時間，也有其他因素，例如：參與的技術、知識或者自信心，所以擁有越多這些資源的人就越容易參與公共事務，社會階層越高（越有錢或教育程度越高）的人，這群人能接觸的人比較多（網絡廣度與異質性高）、聲望比較高（網絡達高性高），也更容易透過關係動員多元的社會資源，也容易會有更高的政治效能感，都可預期會有更高的公共事務參與意願。而俞振華、翁定曄（2017）也歸納國外相關的文獻，將民眾參與政治整理為三個研究途徑，包括「社會結構途徑」（social structure model）、「態度途徑」（attitudinal model）、以及「文化途徑」（cultural model）（Norris, 2002）。其中的社會結構途徑所強調的是社會的不同分歧，例如性別、年齡、教育程度、種族、階級與階層等，都反映了個人參與政治活動資源（金錢、時間），以及能力（技能、知識）的差異，而個人在社會網絡的位置也會影響一個人參與政治活動的意願，恰好也與 Nan Lin（2001a, b）社會資本理論聚焦在個人可以接觸和動員資源

的廣度、異質性和階層出發的觀點契合。

另外，在 Smith (1999) 的研究中，也認為社會資本理論能作為公民政治社會化理論的補充，他利用美國「國家教育縱貫研究」(National Educational Longitudinal Study, NELS)，針對 1988 年起，美國 1,052 所不同學校約 25,000 名學生，研究社會資本在青年生活中的政治成果，探討青年對個人社會資本的投資是否會在其成年後產生更大的政治參與和公民德行，其發現當一個人在青年時期擁有更為強大的個人社會資本，與其成年後的個人政治與公民行為有很大的關聯，通過與父母、學校、社交活動與他人的接觸，有助於提升其政治參與的行為。另外，Vrablikova 與 van Deth (2017) 針對總體和個人社會資本如何影響西方民主國家公民意識進行研究，以「多階層模型」(multilevel models, MLM) 測試兩種不同社會資本的影響，以及交互作用，運用「國際社會調查計畫」(International Social Survey Programme, ISSP) 蒐集 28 個國家的資料進行分析，其發現不同模式的社會資本個別都能對公民意識有積極的影響，值得注意的是，特別是在總體社會資本更豐富的環境下，個人社會資本高的個體，會表現出更高的政治積極性，說明了已經能從個人社會資本獲取較好資源的個體，也會試圖從社會資本豐富的環境之中獲取更大的利益。

而從社會網絡觀點出發，社會資本意指為鑲嵌於網絡中的資源，個人在行動時能夠獲取和使用的資源 (Lin, 2001a, b)。每個人都身處在社會關係的網絡之中，網絡的成員可能包含了熟識的親朋好友、鄰居，或者同一個單位或社團的人，而當個人處在一個網絡中的中心點或者相對複雜的網絡關係中時，往往更傾向於參與公共事務活動。盛杏媛 (2013) 就指出個人社會網絡關係促使其關心公共事務意願的幾點原因：

- (一) 參與公共事務是需要成本的，包含技術與資訊，而良好的社會關係網絡能提供個人介入政治所需要的資訊，降低蒐集相關資訊的成本，也因此促使個人更易於參與政治。
- (二) 個人會在社會關係網絡中觀察他人來形塑自己的意見與行為傾向，並留意在社會關係網絡裡的人是否偏離或遵循社會期望，而在高社經地位的人的社會期望通常是注重公眾形象，比較傾向會去主動關心公共事務。
- (三) 就政治菁英的角度而言，利用社會網絡來動員一般大眾是最有效的管道，因此政治菁英會加強動員那些在關係網絡裡處於核心位置的人，再由這些人幫他去動員其他的人，也因此那些在關係網絡裡處於核心位置

的人最易於去參與政治。

個人社會資本還提供了社會網絡中擁有的資源，從而促進合作（van der Gaag & Snijders, 2004）。個人社會資本也降低了參與公共事務的交易成本，因為與其他人相比，在彼此的信任關係下，保證合規性所需的資源更少（Ripberger, 1998）。依照這樣的推理脈絡，意味著個人社會資本含量較高的民眾，會比其他在社會環境中面臨更高機會成本的人，更願意「讓民主發揮作用」，以增加獲取其他資源的途徑。¹ 所以個人社會資本較高的民眾，較能夠獲得與動員社會關係的資源，在對公共事務的參與中能降低與他人互動的成本，促進彼此合作，也更積極參與公共事務。

依郭秋永（2009：67-68）的觀點指出，在民主國家選任官員來治理國家，而監督這些官員的言行，並判斷其政策的良窳，既是公民的權利也是義務與責任。換句話說，公民意識乃是一種參與倫理，許多研究都說明公民意識與公民參與的相關性。林瓊珠（2016）認為公民意識概念包含規範性的意涵，也與政治涉入行為的過程與取向有關，其採用跨時的資料研究結果顯示雖然公民意識對選舉參與無顯著影響，但跟政治參與的確有正向且顯著的關聯性。楊貴、陳韻暄（2020）運用 2012 年與 2018 年兩波公民意識調查資料進行分析，發現公民意識對「常規」（conventional）與「非常規」（unconventional）的政治參與有顯著正向的作用，臺灣民眾的公民意識與政治參與行為有顯著的關連性。Wang 和 Weng（2017）使用 2015 年「公民意識與公民不服從」的調查資料，也支持當臺灣民眾公民意識與公民不服從感愈高，愈傾向非常規性政治參與的論點，特別是學運、集會、遊行和罷工等活動。值得注意的是，公民意識與公民參與雖然息息相關，但是並非是相同概念，從公民意識的意涵觀之，公民意識係為公民對於在公共領域中所享有的權利、應盡的義務及其內涵有正確的觀念與認知，基於這樣的認知而產生整體的共同意識，並且這樣的意識會帶動公民對公共事務的行為表現，驅使其主動參與促進公

¹ 這樣的論述有可能會陷入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和既得利益者角色的批評，而這是否反映「公民意識」的提升，可能又有討論的空間。從文獻的推論，個人社會資本含量高的人，通常也代表了擁有較高的社會經濟條件（傅仰止，2014），這些被馬克思視為既得利益者的群體，會利用其政治經濟的影響力，透過影響政府的政策來控制問題人口，希望維持有利於既得利益者生存的制度環境，所以對公共事務的積極其實是反映了維持其階級利益的需求（周憐嫻，2014：102）。但本文並不想落入這樣的爭論，而從上述研究文獻的歸納看來，少數涉及個人社會資本與公民意識發展關聯性的文獻，確實驗證了個人社會資本對公民意識和公共事務參與可能的積極效果。

共利益的行動（許文傑，2000；游欣儀，2004；莊文忠，2010；徐明莉、莊文忠，2020）。申言之，公民意識是一種參與倫理，公民參與行為即是公民意識的落實與實踐（游欣儀，2004；莊文忠，2010）。

傅仰止（2014）志願結社與日常接觸對於公民意識的效應研究，探討的是兩項社會參與途徑如何反映公民社會中政治效能感、討論公共議題頻率，以及對公民的責任與義務的規範感知。傅仰止（2014）首先以「志願結社」的測量，延續傳統集體性社會資本對公民社會發展的意涵研究，其認為參加社團除了是瞭解公民社會發展程度的重要指標，也是民主發展的基石（Paxton, 2002; Putnam, 2000）。另一方面，考量到僅以「志願結社」等正式社團參與指標測量的限制，另以「日常接觸」來涵蓋不拘形式的社會活動。相較於測量社團參與數量，以「日常接觸」的問法是立基於社會網絡的觀點，與本研究個人社會資本所欲測量的概念較為接近。傅仰止（2014）認為，僅以社團參與進行測量，遇到平常並無參與社團，或者因為經濟或其他因素不能參與社團的人而言，在計算社會資本會有所限制，造成臺灣的社會資本可能被低估的風險。傅仰止（2014）發現無論是社團參與或是個人接觸職業的廣度和聲望，都會對民眾公民責任義務的規範感知造成正向且顯著的影響，某種程度也驗證了臺灣社會中無論集體和個人的社會資本，都有可能對公民意識的提升造成正向的影響。

總的來說，當前國內有關個人社會資本的研究，大多是用來討論在勞力市場的謀職與升遷中的優勢條件，或是能取得較佳的教育成果或個人經濟成果（Lin, 2001a, b）；個人在於網絡方面資源的多寡，是否會影響其公民意識的高低，是一個還待被討論深究的議題。從過往文獻的研究大致可以歸納出以下結論：首先，公共事務的參與有其門檻與成本，相較於低社會資本的個人，高社會資本的民眾在政治活動的資源上會有所差異，不管是金錢、時間或者資訊與知識方面，都能使其更容易參與；其次，個人網絡接觸的廣泛性高、異質性高、接觸的頻率高有助於提升個人的政治練達度與信心；再者，高社會資本的人通常處於較高的社經地位，而對於高社經地位者的社會期望，通常是關心公共事務的，也符合網絡裡社會期望的結果而形塑這樣的行為傾向；最後，從政治效能感來看，個人社會資本豐富的人通常社會網絡較為綿密，情感與工具性網絡的規模較大，容易擁有經濟的資源與政治和社會的聲望，也較容易對群體事務有比較多的影響力，也比較不容易有政治冷感的情形。

四、世代的界定與差異

本研究另外一個探討的核心，是社會資本和公民意識世代差異的問題。在許多的世代差異研究文獻都指出，不同世代在歷經不同重大政治及社會事件影響下，將導致政治態度的差異，而政治態度乃公民意識中重要的一環，可想而知，世代的差異可能也會與公民意識的高低有所關連，也可能會造成其參與公共事務的積極度或形式有所不同。從新聞事件來看，當前年輕群體對公共事務的參與較為熱衷，更有年輕人公民意識崛起之調，遠見雜誌在 2014 年 9 月 30 日以〈搶攻年輕人選票，九合一選舉決戰關鍵 30%〉，點出臺灣 20-35 歲人口長期以來政治冷感，但歷經社運、學運，引發他們關注公共事務，走上街頭，成為足以左右大選結果的關鍵，更有分析指出 2016 年的政黨輪替，是因為 20-39 歲年輕選民高投票率所致。

本研究所指世代政治，定義為不同年齡群體與出生世代所持有的政治態度，而在與年齡有關的政治態度中，崔曉倩與吳重禮（2011: 14-15）提到主要可以歸納為四種學說，分別是「終身持續效應」（lifelong persistence effects）、「終身開放效應」（lifelong openness effects）、「世代效應」（cohort effects），以及「生命週期效應」（life-cycle effects）（陳陸輝，2010: 341-342；Jennings & Niemi, 1981: 19-22）。前兩者分別代表兩個極端的觀點：「終身持續效應」強調個人早期政治社會化歷程就決定了日後的政治心理認知及政治行為；「終身開放效應」則認為個人終其一生都「有可能」調整其政治態度，但有可能並不代表一定會改變。

「世代效應」與「生命週期效應」觀點則介於這兩者極端之間，「世代效應」的立論認為出生在同一時期下的群體，會因為面對共同的時空背景、社經環境而有相近的成長經驗，進而擁有相近的政治態度。「生命週期效應」則是認同個體的生長週期會影響其政治態度，面對生命不同階段而調整其政治態度，例如年齡較輕的個體因為對政治體系還不夠熟悉，政治態度屬於不固定或者具改變社會的熱情而具有叛逆的傾向；但隨著年紀增長會因為人生閱歷的豐富相對來說政治行為會越趨較保守，而且隨著對於政治事務熟悉而強化其特定的政治態度，大致呈現的是公民意識隨年紀增長而增強的態勢；但當年齡達到 65 歲以上者，可能因為身體機能的逐漸衰退，加之社交接觸活動頻率下降，對於政治社會涉及的程度減弱，因此政治活動開始呈現下滑的趨勢（Milbrath & Goel, 1977; Reynolds, 1974; Rosenstone & Hansen, 2003；崔曉倩、吳重禮，2011）。在後續有關政治世代的分析當中，本研

究著重的是世代效應以及生命週期效應。

就世代效應的部分，本研究參考陳陸輝（2000）與包正豪（2009）的分類方式，按照臺灣重大政治或者社會事件發生的時間進行分界，將受訪者總共分為四個具有政治意涵世代。首先，本研究以西元 1943 年（民國 32 年）以前出生的受訪者分作第一代，這個世代大多接受國民黨的國小教育，成長於國民黨專政的統治時期；再者，以 1943 年至 1960 年（民國 32 年至 49 年）為第二代，其成長期經歷了選罷法的通過以及許多黨外運動蓬勃發展挑戰國民黨的時期，並且目睹我國退出聯合國、中美斷交等重大外交挫敗；第三，以 1960 年到 1976 年（民國 49 年至 65 年）之間為第三代，主要在青壯年時期經歷民進黨、建國黨的成立，正是言論自由開放及民主轉型的時期。第四代是包正豪（2009）接續了陳陸輝的研究所設計的，主要以 1976 年（民國 65 年）為新的切割點，理由是臺灣在 1987 年（民國 76 年）解嚴，1976 年出生者約已完成國民小學教育，即面臨民主制度轉型的開端（1986 年民進黨成立、1987 年解嚴），換言之，這個世代的人完全成長於民主制度之下，受到威權統治的影響最小，可能是公民意識最為強烈的世代。故本研究沿用過去研究者的世代分類方式，分別以 1943 年、1960 年以及 1976 年為第一代（75 歲以上）、第二代（58-75 歲）、第三代（42-58 歲）及第四代（42 歲以下）的分界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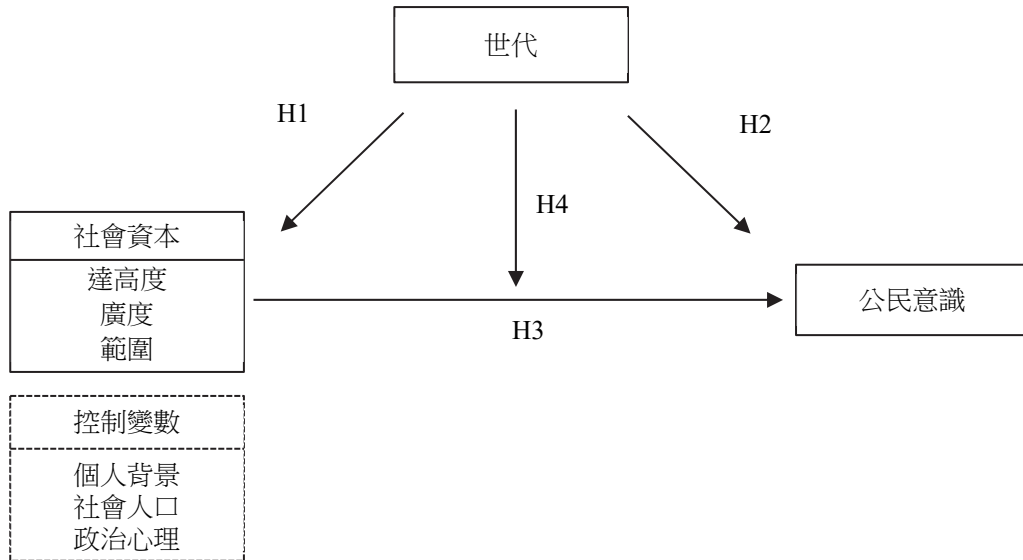
此外，在社會資本的討論，由於本研究關注的社會資本是個人網絡的廣泛性、異質性與達高度，一個人的社會資本，與其進入社會時間的長短和生命的歷程有密切的關係，一般來說年輕人社會接觸面較少，社會資源不豐富，社會資本較為稀薄，但若以 65 歲以上的老人家來說，退休後社會資本也容易產生衰退。一般來說，個人社會資本最豐富的時期，應該多是職業生涯頂峰的中壯年時期。也就是說，無論是社會資本或是公民意識，不同的年齡層可能都會有所差異，公民意識的差異可能來自於其不同世代所反映的政治態度與氛圍，社會資本的差異則來自於生命歷程中人生閱歷上的差異。

參、研究設計與方法

一、研究架構與假設

本研究依據上述理論的耙梳，將社會資本、公民意識與世代差異間的關係簡單

描繪如圖一所示，並據以提出研究假設：首先，不同世代分別在社會資本與公民意識會有顯著的差異；其次，觸及的社會資本含量會正向影響公民意識的高低；最後，社會資本與公民意識的關聯性會受到世代差異的調節影響。



圖一 研究架構圖

根據研究目的與問題，本研究提出之假設如下：

- H1：不同政治世代在社會資本含量上有顯著差異。
 - H1-1：不同政治世代在達高度有顯著差異。
 - H1-2：不同政治世代在廣度有顯著差異。
 - H1-3：不同政治世代在範圍有顯著差異。
- H2：不同政治世代在公民意識有顯著差異。
- H3：社會資本的含量越高對公民意識有正向影響。
 - H3-1：社會資本中的達高度越高對公民意識有顯著正向影響。
 - H3-2：社會資本中的廣度越高對公民意識有顯著正向影響。
 - H3-3：社會資本中的範圍越高對公民意識有顯著正向影響。
- H4：世代差異對於社會資本與公民意識的關連性有顯著調節效果。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將「個人社會資本」依據 Lin (1982) 的定義，轉換為「達高度」、「廣度」與「範圍」三個面向；「公民意識」的部分採納郭秋永 (2009) 的定義，區分為「公開質疑政治權威的意願」以及「公開論述政策良窳的意願」兩個層面。

(一) 社會資本

社會資本採用林南等所設計的定位法蒐集相關資料 (Lin & Dumin, 1986; Lin, Fu, & Hsung, 2001)，並在個人觸及的社會網絡題組的設計，參考 2012 年東亞社會資本調查採用的 10 題定位法，此測量方式是由林南在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五期三次所使用的 22 種職業位置，後續又經過嚴謹的方法測試，做出適用於東亞國家的十題精簡版，對民眾日常交往所能接觸到的職業位置網絡資源做測量 (熊瑞梅, 2014)。這十題的測量題項是直接應用在東亞數十個國家社會資本調查，所以其有三個重要的特點：具有一般化的特質；適合東亞國家的社會脈絡與國情；與 22 種職業位置的版本相比，填寫負擔較輕，可操作性更高，因此回收資料的信效度不會比 22 種職業類別的差。

不同職業所帶來的資源多寡是不均的，因此職業類別轉換社會資本，需要做的是建構「質」的測量指標 (傅仰止、張心潔, 2014)，本研究將上述 10 種職業類別，另外依據標準國際職業聲望量表 (SIOP) 2008 年的版本分別賦予聲望分數代表，並進行後續達高度、廣度及範圍的計算，這十個職業及其國際職業聲望分數 (SIOPS-08) 分別為：大學教授 (78.16)、律師 (73.10)、護士 (54.05)、電腦程式設計師 (51.00)、中學老師 (62.63)、人事主管 (58.00)、農民 (43.53)、美髮師 (32.00)、櫃檯接待 (37.83)、警察 (40.89)。

社會資本三個指標意涵與計算方式說明如下：

- (1) 達高度 (upper reachability)：人脈及關係可及的最高聲望，指涉的是透過社會連帶獲得的最佳資源，反映此一位置在結構或社群中的相對地位、階級與權威。計算方式為個人所能接觸的職業中，職業聲望最高者，以本研究而言最大值為大學教授 78.16，最小值為美髮師 32.00。
- (2) 廣度 (extensity)：能夠觸及的位置數量，反映中心個人透過社會連帶所觸及的位置，以及鑲嵌其中的資源多樣性。所認識的社會階層越廣

泛，其社會資本的含量更勝於人脈關係局限於少數階層的人。計算方式為能接觸到的職業總數，以本研究而言最大值為 10，最小值為 1。

- (3) 範圍／異質性 (range)：透過社會連帶所能觸及的位置資源範圍，反映中心個人透過結構層級中跨越位置的社會連帶，能觸及資源的垂直分布，差異的幅度越大，其社會資本越好。計算方式為能接觸到的職業中，職業聲望分數最高者與最低者之間的差距，以本研究而言最大值為大學教授與美髮師的差距 46.16，最小值為農民與警察之間的差距 2.64。

除了上述三個社會資本指標，在從事分析時，參考慣用的做法將這三個指標標準化處理之後以因素分析建立一個新的總體「社會資本」變項，分別置入平均數檢定與回歸模型之中分析，衡量比較個別指標與總體變項的解釋效力 (Song & Lin, 2009; 李宗榮, 2012)。

(二) 公民意識

本研究採郭秋永 (2009: 67-68) 的定義，認為公民意識是民眾願意為了公共利益而主動參與的認知，並且可以明確知道自己的權利、義務以及社會責任，基於這樣的認知而產生整體的共同意識。此外，公民意識也是公民監督選任官員，判斷其政策良窳的意願，這種意願包含公開質疑政治權威的意願，也包括公開表達本身政治意見、聽取不同政治意見、修正本身政治意見的意願。郭秋永 (2009: 83-84) 認為，與其迷失在公民權龐雜測量概念中，不如將研究焦點集中在以下四個測量的項目上 (莊文忠, 2010; 陳光輝, 2010; 林瓊珠, 2016)：

- (1) 有人說：「政治的事情交給政治人物處理就好」，請問您同不同意這種說法？
- (2) 有人說：「當政治人物的意見與我們不一樣的時候，我們應該公開表達反對的意見」，請問您同不同意這種說法？
- (3) 有人說：「只要做好自己的事，不要過問公眾事務」，請問您同不同意這種說法？
- (4) 有人說：「對於公眾的事務，我們都應該主動發表自己的意見」，請問您同不同意這種說法？

前兩個測量項目用來測量「公民意識」之公開質疑政治權威的意願，後兩個測

量項目用來測量「公民意識」之公開論述政策良窳的意願。然由於在實際操作上，目前大部分的研究成果均將其 4 題加總或加總平均（陳光輝，2010；徐明莉、莊文忠，2020），故本研究也沿用類似的方式處理變數的數值，分數愈高，代表愈具有公民意識。本量表 KMO 值為 0.712 ($p < 0.001$)，適合進行因素分析，各題項的因素負荷量都大於 0.5 的標準，並可以解釋公民意識 66.59% 的變異程度，且 Cronbach $\alpha = 0.824$ ，顯示公民意識量表有良好的信效度。

（三）控制變數

根據相關文獻的探討，本研究的控制變數涵蓋了三個部分：個人背景、社會人口變數與政治心理變數。鑑於公民意識與公民參與或公民社會的高度關聯性，在公民意識研究文獻相對缺乏的狀況下，部份會引用公民參與及公民社會的文獻進行推論。也就是這些因素與公民或政治參與有關聯性時，也可能與公民意識的高低有明顯的關聯性。

在個人背景部分，涵蓋了性別、有無伴侶、教育程度、個人月收入等變數：

第一，性別在公民意識與參與意願的差異，會受到資源條件差異的影響，男女分處不同社經地位或是私領域情境會面臨不同限制；而政治社會化的差異，也會使女性產生低度政治涉入感（楊婉瑩，2007）。第二，有伴侶的家庭生活可能傾向穩定與對權威的服從，反之，單身人士沒有家累，比較可能擁有激進的政治取向（Kingston & Finkel, 1987），因此無伴侶相較於有伴侶者可能會有更強烈的公民意識。第三，教育程度高通常可提高受教者接觸與處理政治資訊的能力（Delli, Michael, & Keeter, 1996; Galston, 2001）；受教者能在特定課程（公民教育）培養參與公共事務的技能與意願（Verba, Schlozman, & Brady, 1995）；而且高教育程度者通常也有較高的社經地位，能以優勢資源來參與公眾事務，也容易處於發生政治活動的網絡之中（Nie, Junn, & Stehlik-Barry, 1996; Persson, 2011）。第四，收入和公共事務參與之間的關係產生了兩種相互競爭的預測：「衝突理論」（The conflict theory）認為，收入不平等會鼓勵民眾參與，其加劇貧富之間的社會分歧，激起窮人的公民意識（Meltzer & Richard, 1981）；而「相對權力理論」（The relative power theory）則假設收入不平等會阻礙公共事務參與。貧富間的資源差距，強化了富人的主導地位（Dahl, 2006），而長期收入不平等與政治挫敗，使窮人易產生政治冷漠，對公眾事務不再關心，影響公民意識強弱。

社會人口學變數涵蓋了主觀社會地位、社區型態、參與社團數、每日接觸人數：

第一，Verba 和 Nie (1972) 認為社會地位愈高，公共事務參與愈積極，也容易有較高的政治效能感等心理特徵和意識，形成特殊的政治興趣促進參與。第二，農村人容易團結起來反對被認為是「城市」或「菁英」的人，再加上農村人相較都市人更易感受到經濟壓力，種種因素讓農村的人更易產生維權或被剝削的意識 (Lyons & Utych, 2021)。然而卻有另外一種解釋是都市對非常規的行為和信仰更加進步與包容 (Simmel, 2012)，在知識的傳遞上也明顯優於鄉村，容易促成新觀念的傳播與發酵，導致都市更多的維權意識與動員 (Milgram, 1970; Cramer, 2016)。第三，Putnam (2000) 認為社團提供討論與表達政治意見的場域，擴大成員獲得資訊與政治思想的機會，並形成評論時事與監督政府的場所；而社團提供培訓場所，成員透過討論議題、開會等訓練公民技巧，培養積極參與公共事務、關心公眾議題的公民德性與公民責任感 (Paxton, 2002; 林珮婷, 2014)。第四，更多的人際接觸，無論正式與非正式溝通都可以讓公民交流資訊，補充公共事務參與的知能，並瞭解參與公眾事務的機會，關心周遭的公共議題，藉此提升公民的責任意識 (Gastil & Dillard, 1999; Rojas et al., 2005)。而擁有更多樣化、規模更大的個人網絡，除了更能夠獲得政治資訊以外，擁有這樣網絡特性的人們也更容易被公民組織或社區領袖招募與動員參與公共事務 (Kotler-Berkowitz, 2005)。

政治心理變數則包含了政黨傾向、政治興趣、政治信任、政治立場等變數：

第一，政黨認同是個人價值觀念與信仰系統中關鍵的一環，也被認為是影響民眾長短期投入的主要因素，其有助於產生心理上的政治參與感，影響到公民意識的強弱 (Campbell, Converse, Miller & Stokes, 1960; 陳光輝, 2010; 盛杏媛, 2010)。第二，政治興趣被定義為對政治具有某種程度的關注，具有政治興趣的公民會特別關心公共議題 (Dostie-Goulet, 2009)，對政治有興趣的公民不僅對公共事務更理解，也更關心 (van Deth, 1989; van Deth & Elff, 2004)，研究上政治興趣對公民意識通常會有正向關聯。第三，Nilson & Nilson (1980) 指出，民眾對於政府官員的信任程度愈低，越可能訴諸抗議性的參與行動。莊文忠 (2010) 研究發現民眾的政治信任感愈低，其反權威意識較高。同樣地，Hooghe & Marien (2013) 認為對政治體系的不信任可能是挑戰權威和非制度化參與的強大動力。第四，政治立場的極端人士可能比溫和派更強烈地關心公眾事務 (Putnam, 2000)，要麼是為了捍衛既有的狀況，要麼是為了改變政治現狀 (Saunders & Abramowitz, 2004; Martin & Van Deth, 2007)。政治參與和投入的可能性也隨著公民在政治立場的兩極化程度而增加，推斷有明確政治立場者的公民意識較高。

三、資料來源與樣本結構

本研究所使用的資料來源為第一作者的科技部（國科會）計畫（計畫編號：MOST 105-2628-H-024-001-SS2）於 2017 年 10 月至 2018 年 12 月間所蒐集的資料，針對都市與鄉村社區年滿 18 歲以上的居民進行面訪調查，總計回收 1,330 份成功問卷。抽樣設計採兩階段抽樣方法：首先，在社區階層的抽樣採用「立意取樣方法」（purposive sampling），針對雲嘉南地區「都市」、「鄉村」、「有營造經驗」、「無營造經驗」等類型進行社區的抽樣；再者，抽出樣本社區以後，再以「戶中選樣法」（household respondent selecting）與「配額抽樣」（quota sampling）抽取受訪者，讓社區居民性別的樣本結構，更為接近該社區居民母體性別的分布狀況。也就是說，本研究在社區層次是採取立意抽樣，讓社區在都市化程度與營造與否能具有代表性，社區條件的差異可能會影響到其社會資本與公民意識的高低；在社區內針對居民的個人層次是採取類似配額抽樣的方式，讓社區抽出的樣本能反映社區居民的結構。

從個人背景資料的樣本特質來說，樣本多為女性，佔 57.70%；婚姻狀況中有伴侶者佔 62.00%；世代分組以第二代佔 35.30% 最多共 470 人，第一代佔 20.10% 最少共 267 人；教育程度以國中及以下佔 40.00% 最多，博士畢業佔 0.60% 最少；個人月收入近 9 成未滿 5 萬，其中以 1 萬-未滿 2 萬佔 19.2% 最多。在人口社會學變數方面，主觀社會地位為受訪者自評，超過一半比例落於中間階層，以第 5 層佔 38.90% 最多，第 6 層佔 20.10% 次之；社區型態中都市型佔 60.80%，農村型 39.20%；參與社團數平均為 1.75 個（ $SD=2.02$ ）；每日接觸人數以 5-9 人佔 24.5% 和 10-19 人佔 24.3% 最多。政治心理變數方面，泛藍 132 人佔 9.90%，泛綠 189 人佔 14.2%；政治興趣平均為 1.78（ $SD=0.87$ ），落於「一點也沒興趣」至「不太有興趣」之間；對於政治人物的政治信任分數平均為 2.21（ $SD=0.77$ ），多數偏向不信任；政治立場平均 5.33（ $SD=2.05$ ），落於中立偏向右派（詳細圖表請參照附錄一、二）。

在解釋變數與依變數的特質來說，受訪者的達高度平均為 62.50（ $SD=14.70$ ），代表受訪者平均所能接觸到最高的職業聲望；廣度平均為 3.76（ $SD=2.56$ ），代表受訪者於 10 個職業類別中平均所能接觸職業數量；範圍平均為 30.20（ $SD=13.62$ ），代表受訪者平均所接觸到的職業類別中，最高與最低的聲望分數的差距；依變數公民意識的部分，經過反向處理後，平均數為 3.14（ $SD=0.89$ ），受訪者普遍具有一

定程度的公民意識（詳細圖表請參照附錄二）。

肆、分析與討論

一、社會資本的世代差異

社會資本各指標與不同世代的差異性檢定結果如表一，達高度的部分呈現第二、三、四代皆顯著大於第一代，代表相較於第一代，第二、三、四代所能接觸到的職業聲望較高，就平均數的高低來看，愈年輕的世代達高度愈低；廣度的部分呈現出第二、三、四代顯著大於第一代，第三世代顯著大於第二代，晚近世代相較於早期世代有更加優勢的網絡資源；在範圍的部分一樣呈現出第二、三、四代顯著大於第一代；最後，在社會資本部分，一樣呈現出第二、三、四代顯著大於第一代，第三世代則顯著大於第二代，總的來說，各個指標面向都呈現晚近的世代，其社會資本的含量較早期的世代還要高，其中在廣度與社會資本指標，第三世代的平均數皆高於其他世代，符合普遍預期目前 40 至 60 歲的青壯年人士，為社會的中堅分子，人際交往以及網絡資源豐富，擁有較為豐沛的社會資本。

表一 社會資本的世代差異

變數	世代	樣本數	平均數	標準差	Levene	F 檢定	事後比較
達高度	(1)第一代	243	58.661	15.276	3.347*	8.494***	(2)>(1) (3)>(1) (4)>(1)
	(2)第二代	436	62.320	14.162			
	(3)第三代	287	64.366	14.280			
	(4)第四代	256	64.374	14.871			
廣度	(1)第一代	243	2.765	1.822	32.344***	20.314***	(2)>(1) (3)>(1) (3)>(2) (4)>(1)
	(2)第二代	436	3.757	2.405			
	(3)第三代	287	4.429	3.019			
	(4)第四代	256	3.969	2.600			
範圍	(1)第一代	172	26.406	13.589	0.737	6.572***	(2)>(1) (3)>(1) (4)>(1)
	(2)第二代	354	30.072	13.388			
	(3)第三代	235	31.759	13.965			
	(4)第四代	207	31.823	13.113			
社會資本	(1)第一代	172	-0.091	0.766	3.431*	10.948***	(2)>(1) (3)>(1) (3)>(2) (4)>(1)
	(2)第二代	354	0.149	0.824			
	(3)第三代	235	0.348	0.902			
	(4)第四代	207	0.289	0.789			

* $p < 0.1$,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二、公民意識的世代差異

從表二的檢定結果可以得知，在不同世代間公民意識的差異，其中第二代顯著大於第一代，第三代顯著大於第一、二代，第四代則皆顯著大於其他三個世代，大致呈現出晚近的世代，其公民意識高於早期的世代，年輕人相較於年紀稍長者，擁有更加強烈的公民意識。換言之，愈年輕的世代，其成長的環境愈接近民主轉型的時期，民主與反抗權威的意識，以及教育制度與內容的解禁，都相較於之前的世代濃厚，也因此展現了愈年輕的民眾，公民意識愈強的分析結果。

表二 公民意識的世代差異

變數	世代	樣本數	平均數	標準差	Levene	F 檢定	事後比較
公民 意識	(1)第一代	266	2.680	0.920	6.037***	50.099***	(2)> (1)
	(2)第二代	464	3.074	0.852			(3)> (1)
	(3)第三代	310	3.268	0.844			(3)> (2)
	(4)第四代	281	3.531	0.742			(4)> (1)
						(4)> (2)	
						(4)> (3)	

⁺ $p < 0.1$,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三、社會資本與公民意識的關連性

對於不同世代間社會資本與公民意識關連性的分析，分析結果本研究因分析樣本數的差異，將分析結果區分如表三與表四的模型所示：表三的模型一與表四的模型四，分別為模型二、模型三與模型五、模型六的基準模型，基準模型僅置入控制變數。

而在本研究解釋變數的處理，過往的文獻指出，因為彼此之間具有顯著的相關性，以社會資本的三個指標—達高度、廣度和可及聲望範圍（下面簡稱範圍）為自變數，容易產生多元共線性的問題（Lai, Lin, & Leung, 1998; van der Gaag, Snijders & Flap., 2008: 39；李宗榮，2012），所以並未將三個指標放入同一個模型進行測量，而是將社會資本的三個指標—達高度、廣度和範圍分別置入迴歸模型二、三、五之中，針對公民意識的效果分別進行檢測；模型六則是採用傳統社會資本理論研究者所使用的方式，置入社會資本三個指標因素化的變數。

本研究將置入達高度、廣度指標的模型二、模型三，與置入範圍與社會資本指

標的模型五、模型六分開處理，主要肇因於範圍的計算方式。範圍主要是來自於十個職業中，所認識職業聲望最高者與職業聲望最低者的分數差而得，但如果受訪者在這十種職業類別中僅認識一個，或全部都沒認識，就無法計算出範圍的數值，只能 coding 成遺漏值，而社會資本的分數又是來自於三個指標，因此造成模型五與模型六樣本數（ $N=799$ ）相較於模型二與模型三（ $N=1015$ ）明顯降低，為避免模型之間樣本數下降過多無法比較，因此將不同樣本的模型區分表列。

首先，在模型一的基準模型中，整體的解釋變異量為 32.50%，其中教育程度對公民意識有顯著正向預測效果，顯示越高的教育程度有越強的公民意識（ $B=0.184, p<0.001$ ），但性別、有無伴侶及收入等其他變數則沒有顯著的預測效果。在社會人口學變數方面，都市社區的居民相較農村社區居民對公民意識有正向預測效果（ $B=0.128, p<0.05$ ），呈現都市社區的居民有更強烈的公民意識；而參與社團數也產生正向預測效果（ $B=0.036, p<0.01$ ），加入的社團類型越多，公民意識也會增強，這樣的結果驗證了 Putnam（1993, 2000）對社團參與和公民社會正向關聯性的觀察；值得注意的是，在主觀的社會地位與每日接觸人數則沒有顯著的影響。

在政治心理變數方面，各個變數皆對公民意識造成程度不一的顯著預測效果，政黨傾向中泛藍（ $B=0.256, p<0.01$ ）與泛綠（ $B=0.204, p<0.01$ ）的支持者相較中立的受訪者，都呈現了正向的預測效果，顯示有較鮮明的黨派支持傾向，其公民意識也會越加強烈；此外，擁有高度的政治興趣（ $B=0.201, p<0.001$ ），對於公民意識也有十分顯著的預測效果。最後，可以發現政治信任與政治立場兩者對於公民意識呈現顯著的負向效果，政治信任感越加低落以及政治立場的左派傾向，其公民意識會越加強烈。

至於本研究的解釋變數—社會資本，在模型二、模型三分別置入社會資本的達高度以及廣度，整體模型的解釋變異量分別提升為模型二 $R^2=0.330$ （ $\Delta R^2=0.005, p<0.05$ ）、模型三 $R^2=0.329$ （ $\Delta R^2=0.004, p<0.05$ ），顯示在控制個人背景變數、社會人口學變數以及政治心理變數下，社會資本的達高度與廣度指標對公民意識具有正向顯著的預測效果，驗證了本研究的假設。

表三 社會資本與公民意識的關連性（模型一至三，N=1015）

變數	公民意識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截距	2.383*** (0.147)	2.180*** (0.166)	2.391*** (0.146)
控制變數			
個人背景			
性別（女性=0）	-0.007(0.048)	-0.002(0.048)	0.001(0.048)
有無伴侶（無=0）	-0.046(0.050)	-0.046(0.050)	-0.058(0.050)
教育程度	0.184*** (0.024)	0.171*** (0.024)	0.179*** (0.024)
個人月收入	-0.003(0.008)	-0.002(0.008)	-0.003(0.009)
社會人口學變數			
主觀社會地位	0.015(0.015)	0.012(0.015)	0.010(0.015)
社區型態（農村=0）	0.128* (0.052)	0.100+ (0.053)	0.116* (0.052)
參與社團數	0.036** (0.012)	0.030* (0.012)	0.029* (0.012)
每日接觸人數	-0.017(0.016)	-0.020(0.016)	-0.024(0.016)
政治心理變數			
政黨傾向（中立=0）			
泛藍	0.256** (0.080)	0.248** (0.080)	0.265** (0.080)
泛綠	0.204** (0.071)	0.204** (0.071)	0.203** (0.071)
政治興趣	0.201*** (0.030)	0.199*** (0.030)	0.200*** (0.030)
政治信任	-0.133*** (0.031)	-0.129*** (0.031)	-0.130*** (0.031)
政治立場	-0.027* (0.012)	-0.026* (0.012)	-0.026* (0.012)
世代（第一代=0）			
第二代	0.281*** (0.066)	0.270*** (0.066)	0.268*** (0.066)
第三代	0.359*** (0.075)	0.348*** (0.075)	0.338*** (0.076)
第四代	0.444*** (0.084)	0.437*** (0.084)	0.430*** (0.084)
解釋變數			
達高度		0.005* (0.002)	
廣度			0.025* (0.010)
R ²	0.325	0.330	0.329
Adj R ²	0.314	0.318	0.318
F	30.032***	28.823***	28.791***
△R ²	0.325***	0.005*	0.004*
N	1015	1015	1015

+ $p < 0.1$,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註：1. 主觀社會地位：由低至高，分為1-10等級。

2. 政治立場：左派至右派，分為0-10等級，5為中立。

3. 括號內為標準誤（Standard Error, S.E.）值。

繼之，在表四的部分：首先，模型四的基準模型中，整體的解釋變異量為31.40%，教育程度對公民意識一樣有顯著正向預測效果，顯示越高的教育程度有越強的公民意識（ $B=0.183, p<0.001$ ），而性別、有無伴侶及月收入等其他個人背景變數則一樣沒有顯著的預測效果。在社會人口學變數方面，都市社區相較農村社區一樣對公民意識有正向預測效果（ $B=0.139, p<0.05$ ），呈現的是都市社區的居民更強烈的公民意識；而參與社團數也一樣產生正向預測效果（ $B=0.037, p<0.01$ ），同樣驗證了社團參與和公民社會的正向關聯；其他如主觀社會地位與每日接觸人數對公民意識則同樣沒有顯著的影響。

在政治心理變數方面，政黨傾向一樣具有顯著預測效果，相較中立的受訪者，鮮明的黨派支持傾向，影響其公民意識越加強烈；而擁有高度的政治興趣（ $B=0.213, p<0.001$ ），對於公民意識也有十分顯著的正向預測效果。最後，一樣可以發現政治信任顯著的負向效果。

至於本研究的解釋變數—社會資本，在模型五、模型六分別置入社會資本的範圍指標以及合併三個指標的綜合變數，整體模型的解釋變異量分別提升為模型五 $R^2=0.319$ （ $\Delta R^2=0.005, p<0.05$ ）、模型六 $R^2=0.320$ （ $\Delta R^2=0.006, p<0.05$ ），顯示在控制個人背景變數、社會人口學變數以及政治心理變數下，範圍與社會資本綜合變數對公民意識具有正向顯著的預測效果，也驗證了本研究的假設。

值得特別注意的是，在世代的部分，兩個基準模型當中，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相較於第一代，皆對公民意識的解釋有顯著正向的預測效果，顯然第二、第三與第四代相較於第一代，在公民意識的強弱上有明顯的落差；而模型二及模型三則顯示加入了達高度與廣度等變數之後，對公民意識高低的預測效果是增強的，但增強的效果並不強烈。另外，在置入社會資本變數以後，社區型態以及參與社團數等變數的預測效果產生明顯且一致的變化，預測效果下降。最後，在模型五及模型六當中，本研究分別置入了範圍及社會資本綜合變數，政治立場即失去預測效果，說明政治立場對於公民意識之所以會有顯著的預測效果，也有可能是受到範圍及總體的社會資本因素的影響。

表四 社會資本與公民意識的關連性（模型四至六，N=799）

變數	公民意識		
	模型四	模型五	模型六
截距	2.413 ^{***} (0.171)	2.373 ^{***} (0.172)	2.539 ^{***} (0.177)
控制變數			
個人背景			
性別（女性=0）	-0.050(0.055)	-0.035(0.055)	-0.037(0.055)
有無伴侶（無=0）	-0.039(0.058)	-0.046(0.058)	-0.050(0.058)
教育程度	0.183 ^{***} (0.026)	0.175 ^{***} (0.026)	0.173 ^{***} (0.027)
個人月收入	-0.004(0.010)	-0.006(0.010)	-0.007(0.010)
社會人口學變數			
主觀社會地位	0.009(0.017)	0.005(0.017)	0.004(0.017)
社區型態（農村=0）	0.139 [*] (0.059)	0.112 ⁺ (0.060)	0.110 ⁺ (0.060)
參與社團數	0.037 ^{**} (0.013)	0.031 [*] (0.014)	0.030 [*] (0.014)
每日接觸人數	-0.004(0.019)	-0.010(0.019)	-0.010(0.019)
政治心理變數			
政黨傾向（中立=0）			
泛藍	0.249 ^{**} (0.090)	0.239 ^{**} (0.090)	0.245 ^{**} (0.090)
泛綠	0.242 ^{**} (0.080)	0.240 ^{**} (0.079)	0.240 ^{**} (0.079)
政治興趣	0.213 ^{***} (0.034)	0.211 ^{***} (0.034)	0.210 ^{***} (0.034)
政治信任	-0.151 ^{***} (0.036)	-0.149 ^{***} (0.035)	-0.149 ^{***} (0.035)
政治立場	-0.022(0.014)	-0.022(0.014)	-0.022(0.014)
世代（第一代=0）			
第二代	0.208 ^{**} (0.077)	0.192 [*] (0.077)	0.191 [*] (0.077)
第三代	0.335 ^{***} (0.087)	0.319 ^{***} (0.087)	0.311 ^{***} (0.088)
第四代	0.429 ^{***} (0.098)	0.410 ^{***} (0.098)	0.406 ^{***} (0.098)
解釋變數			
範圍		0.005 [*] (0.002)	
社會資本			0.093 ^{**} (0.035)
R ²	0.314	0.319	0.320
Adj R ²	0.300	0.304	0.305
F	22.344 ^{***}	21.530 ^{***}	21.588 ^{***}
ΔR ²	0.314 ^{***}	0.005 [*]	0.006 ^{**}
N	799	799	799

⁺p<0.1, *p<0.05, **p<0.01, ***p<0.001

註：1. 主觀社會地位：由低至高，分為1-10等級。

2. 政治立場：左派至右派，分為0-10等級，5為中立。

3. 括號內為標準誤（Standard Error, S.E.）值。

四、世代對於社會資本與公民意識的調節效果

如表五所示，首先在社會資本與第二代的交互效果之迴歸係數為正值（ $B=0.035$, $p=0.588$ ），未達顯著，表示第二代對於社會資本與公民意識關係，並不具備調節效果。而社會資本與第三代的交互效果之迴歸係數為正值（ $B=0.070$, $p=0.306$ ），同樣未達顯著，表示第三代對於社會資本與公民意識關係，一樣不具備調節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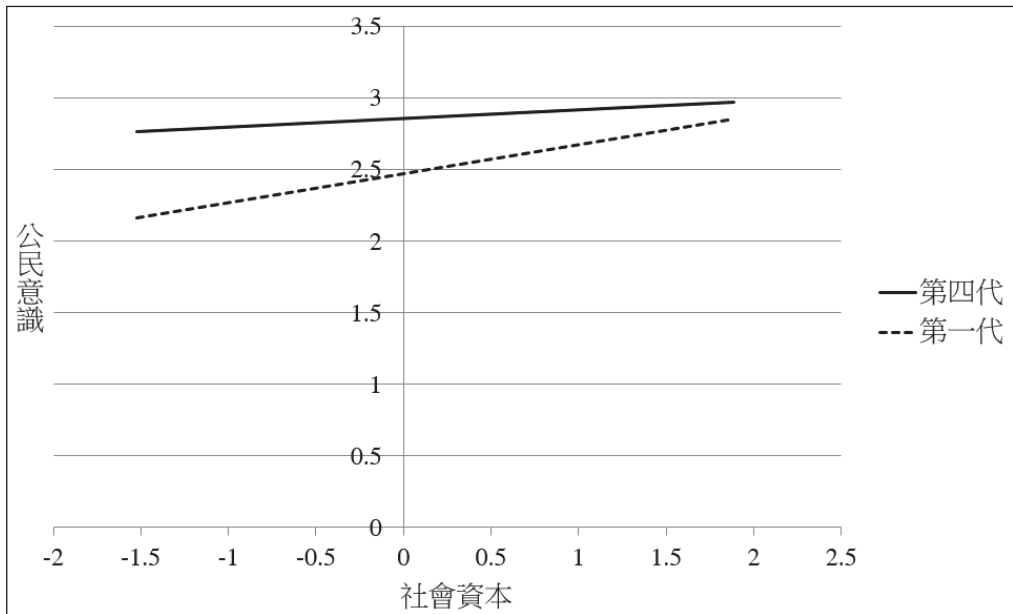
在模型三的部分，社會資本與第四代調節效果之迴歸係數為負值（ $B=-0.172$, $p<0.05$ ），且達顯著性，表示第四代與第一代的受訪者在社會資本與公民意識的關連性間可能有明顯的落差。首先，在調節效果顯著的部分，從社會資本變數（ $B=0.131$, $p<0.01$ ）可以看出，在調節效果的模型中，一樣有社會資本越高，公民意識越強的顯著效果。另外從交互作用圖（圖二）呈現的是；第一代與第四代的公民意識變動隨著社會資本高低的變動有所差異，尤其在低社會資本的情況下兩個世代間的公民意識較大，但倘若在高社會資本條件下的第一代與第四代，公民意識間的差距便隨之縮小，因此第一代的民眾公民意識的高低確實與社會資本的含量關連性較高。

表五 世代對於社會資本與公民意識之調節效果迴歸分析

變數	公民意識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截距	2.542*** (0.178)	2.538** (0.177)	2.568*** (0.177)
控制變數			
個人背景			
性別 (女性=0)	-0.037(0.055)	-0.035(0.055)	-0.033(0.055)
有無伴侶 (無伴侶=0)	-0.051(0.058)	-0.053(0.058)	-0.056(0.057)
教育程度	0.173*** (0.027)	0.174*** (0.027)	0.172*** (0.026)
個人月收入	-0.007(0.010)	-0.008(0.010)	-0.007(0.010)
社會人口學變數			
主觀社會地位	0.003(0.017)	0.004(0.017)	0.003(0.017)
社區型態 (農村=0)	0.108 ⁺ (0.060)	0.111 ⁺ (0.060)	0.104 ⁺ (0.060)
參與社團數	0.029*(0.014)	0.030*(0.014)	0.026 ⁺ (0.014)
每日接觸人數	-0.010(0.019)	-0.010(0.019)	-0.009(0.019)
政治心理變數			
政黨傾向 (中立=0)			
泛藍	0.247** (0.090)	0.247** (0.090)	0.240** (0.090)
泛綠	0.239** (0.079)	0.242** (0.079)	0.239** (0.079)
政治興趣	0.209*** (0.034)	0.210*** (0.034)	0.205*** (0.034)
政治信任	-0.149*** (0.035)	-0.150*** (0.035)	-0.149*** (0.035)
政治立場	-0.022(0.014)	-0.021(0.014)	-0.022(0.014)
世代 (第一代=0)			
第二代	0.189* (0.077)	0.197* (0.077)	0.181* (0.077)
第三代	0.317*** (0.088)	0.298** (0.089)	0.293** (0.088)
第四代	0.410*** (0.098)	0.415*** (0.098)	0.435*** (0.099)
解釋變數			
社會資本	0.080 ⁺ (0.042)	0.073 ⁺ (0.040)	0.131** (0.040)
交互作用變數			
社會資本 x 第二代	0.035(0.064)		
社會資本 x 第三代		0.070(0.069)	
社會資本 x 第四代			-0.172* (0.079)
R ²	0.320	0.321	0.324
Adj R ²	0.304	0.305	0.308
F	20.386***	20.448***	20.751***
ΔR ²	0.000	0.001	0.004*
N	799	799	799

⁺p<0.1, *p<0.05, **p<0.01, ***p<0.001

註：括號內為標準誤 (Standard Error, S.E.) 值。



圖二 第四代相較第一代對於社會資本與公民意識之調節效果作用圖

總體而言，世代對於社會資本與公民意識關係之調節效果，只有在第四代與第一代間的比較具有顯著的效果，尤其在低社會資本的條件下，兩個世代間的公民意識差異較大，然而在高社會資本的條件下，第一代公民意識的提升就會變得很明顯，顯然對於第一代的民眾來說，較能夠動員網絡資源的人，較願意對公共事務表達意見。且值得注意的是，第四代本身不論在高社會資本或低社會資本的情形下，其公民意識原本就比第一代更加強烈。

伍、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與討論

依據前述分析結果，本研究彙整出以下結論：

首先，從描述性統計的結果來看，政治興趣的平均值偏低僅 1.78（四點尺度），說明多數人對於政治相對冷漠，對具有政治參與意涵的公共事務參與意願也很低。由於參與為民主最直接的表現方式，持續低落的參與意願與政治冷漠感，可能會動搖民主的根基。另外，參與社團數平均僅 1.75 個，呼應熊瑞梅（2014）針對

臺灣社會資本與信任的研究，在東亞四個國家中，臺灣相較於日本與南韓，參與社團的比例最低，相較於東亞的其他國家，臺灣參與正式組織的程度仍然較低；相對來說，受訪者的平均日常接觸人數大致落在 10-19 人，這個人數並不算低，傅仰止（2014）表示，並不能僅僅是以社團參與的指標來測量，更應該將不拘形式的日常接觸納入，才能更全面的檢視臺灣的公民意識建構效應。再者，對於政治人物的政治信任分數平均為 2.21（五點尺度），多數仍偏向不信任，可能動搖政府治理的基礎。

在解釋變數與依變數的特質來說，受訪者社會資本的達高度平均為 62.50，能觸及的職業聲望還算高，代表受訪者平均所能接觸到職業階層不低；廣度平均為 3.76，代表受訪者於 10 個職業類別中平均所能接觸職業數量接近四個；範圍平均為 30.20，代表受訪者平均所接觸到的職業類別中，最高與最低的聲望分數的差距有多少；從上述三個指標也大致可以窺見，臺灣由於地小，人口持稠密、都市化程度高，因此民眾所能在日常接觸到的職業分布也可能較為廣泛，也反映在每日接觸人數的規模較大（林南、陳志柔、傅仰止，2010）。

再者，從社會資本的世代差異檢定方面，在社會資本的三個指標中，可以發現大致呈現的是晚近世代相較於早期世代有更佳優勢的網絡資源，而在總體的社會資本因素中，除了一樣呈現晚近世代相較於早期世代有更佳優勢的網絡資源，另外可以發現第三世代的平均數是大於其他世代的，綜合以上兩個發現，年輕世代的交往較為廣闊，也擁有相較早期世代較好的社會資源，其中目前又以第三世代有最好的資源，大約目前的年齡皆為青壯年人口（42-58 歲間），在社會交往的網絡關係是較多也較緊密的，也可能是在工作事業上最有成就的時間。

而在公民意識的世代差異性檢定方面，可以得知不同政治世代間，公民意識有明顯的差異，而這個趨勢與社會資本所呈現的雷同，大致呈現出來晚近的世代相較早期的世代，其公民意識是更加強烈，尤其可以發現第四代的平均數是遠遠大過於第一世代，說明第四代成長期皆於民主制度之下，受到威權統治的影響最小，連帶正向影響其公民意識的涵養，相較於其他世代有所不同，也更加認同身為公民的責任與意識，對於公眾事務也更加願意發表自己的看法。政治世代的第一代與的第四代成長於兩種極端的政治社會環境，第一代政治社會化歷程深受黨國威權體制的影響，政治參與的空間是受到限制的，相對缺乏反抗權威與質疑政府的意願；而第四代經歷 1986 年民進黨成立與 1987 年宣布解嚴，政治社會化的歷程是與臺灣民主轉型過程同步，加之經歷兩次政黨輪替民主鞏固期，擁有更深刻的民主生活經驗，也

更有條件與意識監督政府的作為與對公共事務抱持熱誠。基本上這樣的研究發現與本研究的假設一致。

第三、就社會資本與公民意識的關連性的驗證模型來說：首先、在控制變數中，越高的教育程度有越強的公民意識（Verba, et al., 1995），但性別、有無伴侶及收入等其他變數，對於公民意識沒有顯著預測能力。在社會人口學變數方面，都市的社區相較農村社區呈現更強烈的公民意識，這很有可能是受到了都市民眾教育程度普遍比農村高，資訊流通快速，以及對政治事務的參與相對容易的影響，導致都市地區的民眾更願意反抗權威與公開對政策進行論述（Milgram, 1970; Cramer, 2016）；而參與社團數越多，也對公民意識有正向的效果，這部份與傅仰止（2014）的研究結果符合，加入的社團類型越多，討論公共議題的頻率及公民責任義務的規範感知也會隨之增強，這樣的結果也證明臺灣社會還是有類似符合西方式以團體格局為公民社會基礎的推論（Putnam, 1993, 2000；熊瑞梅，2014），分析結果也與目前國內政治學界的立場相符；值得注意的是，在主觀的社會地位與每日接觸人數則沒有顯著的影響，與傅仰止（2014）針對日常接觸對於公民意識社會參與效應的結果有差異。

在政治心理變數方面，政黨傾向與公民意識間有統計上的顯著效果，顯示有黨派支持傾向者，其公民意識也會越加強烈，這結果與林瓊珠（2016）和陳光輝（2010）的研究發現一致，對於政黨傾向鮮明的支持者，更加願意公開的論述政策良窳、質疑政治權威的印象；此外，與過去研究一致，擁有越高度的政治興趣，其公民意識也會越加強烈（Dostie-Goulet, 2009）。最後，政治信任與政治立場對公民意識都是負向的影響，過去研究也提及政治信任感越加低落以及政治立場的左派傾向，其公民意識越加強烈（Nilson & Nilson, 1980; Martin & Van Deth, 2007），這部分可能與本研究公民意識問項的組成「公開質疑政治權威的意願」以及「公開論述政策良窳的意願」兩者有密切關連，對於政治人物的強烈不信任感，激發其公開表達意見以及質疑權威當局的意願。而在政治立場的部分，一般而言，「左派」較不滿足於社會的現狀，支持財富與權力的重分配以及提倡個人自由的思想；「右派」則相對滿意現狀，相信菁英統治的合理性，提倡保守主義（陳文俊，2003），可以相信右派支持者「反權威的意識」會相較低於左派的支持者，與多數對於政治立場的相關文獻有一致的解釋。

第四、關於本研究的解釋變數—社會資本，發現社會資本的各個指標皆對於公民意識具有正向顯著的預測效果，驗證了本研究的假設。因此，當個人所可以觸及

的社會關係中的聲望地位越高、當個人在社會當中所能觸及的網絡資源種類越多，都會有較高的公民意識。個人所透過社會連帶觸及的網絡資源中，職業地位的差異幅度越大，也就是資源網絡的分布的差距越大，也會有更高的公民意識。這樣的結果與 Vrablikova 和 van Deth (2017) 的發現一致，即反覆的社會接觸和對現有機會的理性評價，會導致對集體安排的支持。應用於公民社會之中，個人社會資本水準相對較高者，相比於其他在社會環境之中有更高機會成本的人來說，他們更願意使民主體制發揮作用，因為經常性接觸提高了其社交技能，提供了取得其他資源的途徑，也使其更容易激發公民意識的發展；然而該篇論文沒說明的是，個人社會資本水平高的人，相較於水平低的人，雖然更有機會與人脈去動員社會資源，政治效能感理應比較高，但這只是有能力意願反抗權威或表達意見，還是真的會投入反抗權威，卻沒有很明確的說明。在西方社會的研究，個人社會資本確實為個人提供獲取其個人社會網絡中人們擁有的資源的途徑，影響力的提高，促成了其更願意積極參與政治事務，也促進了一定程度的合作 (van der Gaag & Snijders, 2004)。然而高個人社會資本的群體，多半是社會上社會經濟條件好，較具有政治經濟優勢的群體 (傅仰止, 2014)，基於人脈的社會參與所促成的人際互動，是否會跨越既有人脈的藩籬，更積極的為社會公益行動，可能仍需要系統性的檢視。

最後、在調節效果的檢定，僅有第四代與第一代的比較在統計上具有顯著的效果，第一代與第四世代的公民意識變動隨著社會資本高低的變動有所差異，尤其在低社會資本的情況下，兩個世代間的公民意識差距較大，而在高社會資本的條件下，兩個世代間的公民意識差距便隨之縮小，第一世代因社會資本提升進而影響公民意識的幅度較大，但在低社會資本的狀況下，第一代民眾較不願意對公共事務表達關心與意見。這說明在不同世代間，公民意識變動隨著社會資本高低的變動有所差異，尤其第四代的比較更加明顯，年輕人相較於第一世代，不管在高社會資本或第社會資本的情況下，都有較好的公民意識。細究其原因，或許與年輕世代的生長背景有關，從出生時就處在民主深化的臺灣，所有對於公共事務關心與參與的權利與義務對他們來說是非常理所當然，也有更多更方便的管道參與公共事務，也說明了為何第四代的公民意識，相較於其他世代本來就較高。

二、研究建議

依據前述的結論與討論，本研究提出以下的建議，並說明本研究的限制：

（一）政策建議部分

首先，從描述統計中可以發現受訪者多數對於政治非常冷漠，對於具有政治意涵的公共事務參與意願非常的低，另外對於政治人物的信任感也是非常的低落，民主政體最為重要的表現形式之一就是公共參與，民眾出於對這個體制與管道的認同，涉入政府決策並企圖影響公共政策的過程，是一種民主的展現，而當民眾對於政治人物的信任感不斷下降的同時，也包含了對於制度與政府治理的不滿意度，或政治效能感的低落，導致民眾的參與公共事務的意願不高，危及到公民社會的良好發展。換言之，如何去提昇民眾的政治效能感，進而提高民眾對於政府信任以及參與的意願，是目前民主發展十分重要的課題。

其次、政黨的傾向，鮮明的黨派色彩是影響公民意識的重要因素，相對有比較高的政治興趣，也更有傾向去表達自己的政治立場或政策看法，甚至去質疑政治權威當局。但如何去統整不同的意見，而不僅僅只是為了反對而反對，降低社會的衝突，才是維持安穩體制的重要因素。政治信任的程度越低，雖然有較高的公民意識，但政治信任感的持續低落，也可能造成政治溝通上的巨大成本，如何化解政策執行的阻力，包容多元的意見與聲音，才是厚實民主治理的基礎。

再者，從研究中可以發現教育程度也是影響公民意識的重要因素，教育程度愈高對公民意識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說明教育對於國人公民意識養成的重要性。而學校為個人政治社會化的重要學習場所，學校教育可加強受教者公民意識的培養，持續深化我國的公民教育，使國人培養良善公民道德與價值觀，對於公民權利的行使有正確的認知並學習承擔身為公民的責任意識，對公共事務的參與培養積極的態度。

最後、社會資本對於公民意識的預測效果得到了驗證，不管在達高度、廣度、範圍或者是總體社會資本因子都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說明不同面向的網絡資源接觸含量提昇，都會有效提升對於身為公民的責任與權利的意識。社會網絡資源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一個人的社會經濟條件，人面愈廣的人，可能是因為與不同人接觸得多，能夠連結與動員的資源也較多，所以會有較強的政治效能感，也連帶正向的影響其公民意識（傅仰止，2014）。但是在檢視世代的調節效果卻發現，除了第四代本身的公民意識就比較高的因素，第四代與第一代在低社會資本的條件下，公民意識也仍有不小的差距，換言之，年齡層超過中壯年之後或年輕族群的民眾，社會資本均比中壯年低，連帶也影響到公民意識的高低。由於低個人社會資本的群體容易成為社會上的孤立族群，建議可以針對低社會資本、低網絡資源的群體進行更深入

的探析，瞭解這些群體的群眾如何看待政府與政策。

（二）後續研究建議部分

首先、透過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發現公民意識的高低，與政治世代的差異也有關連性。整體而言，呈現的是年輕世代有較高的公民意識，而年長的世代公民意識則較為低落。與林信志（2016）的研究有一致的結果，這樣的結果突顯的是年輕人反叛性格、反權威的特質，而公民意識的形成很大部分受到教育以及資訊接受程度的影響，在成長階段受不同教育環境方針的灌輸、以及教育系統的是否開放程度，或者是資訊流通的速度，影響的是人們論述公共議題的管道以及知識技能的提升，導致了世代的差異。然本研究受限於資料分佈的問題，並未針對網路使用及接觸的程度做測量，建議未來進行公民意識的相關研究，能將該因素納入考量，完善測量的面向。

第二，在資料蒐集上，受限於經費、調查人力的不足，研究者移動、交通易達性以及研究可行性的考量，本研究並未採用全國範圍的隨機抽樣方式，而是採用先抽社區再抽家戶的兩階段抽樣方式，並且以雲嘉南地區為主要調查地理區域，致使本研究可能難以宣稱可以推論到全國範圍普遍性論述，大概只能宣稱我們的分析結果反映了這些社區民眾的情形。未來如若資源上允許，建議使用更加嚴謹的抽樣方式，或結合大型調查的機會（例如：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在某一期調查中同時進行社會網絡和公民與國家組問題的設計，進行全國其他地區樣本的補充與對照，使得相關研究更加周延與完整。

第三，在世代的界定上，本研究的第四代是設定在 1976 年之後，也就是約 42 歲以下的年齡層，這個群體在成長的過程中恰好經歷解嚴與民主化，所以成長的社會脈絡與其他世代更加自由開放，但若更進一步延伸，所謂年輕人公民意識崛起的說法，反映現今引領風騷的世代是屬於 18-35 歲之間被稱之為網路世代的群體，雖然本研究 42 歲年齡層之下涵蓋了網路世代年齡層的民眾，但本研究第四代群體並無法區別新的網路世代與 1976 年後早期群體的差異。因此細究來說，對於網路世代政治參與行為與公民意識的討論，可能會更符合現今討論「年輕族群」公民意識崛起的政治現象。然而，一方面本研究所蒐集資料的群體，是限定在 18 歲以上，所以基本上並不會有 1999 年以後出生的樣本，搞不好現在不少高中生就會上網對公共議題表達其意見；二方面是本研究大多是在日常時間到住家進行面訪，較為年輕的群體在這個時間段有可能會因為上班或上學（甚至離家住校）的緣故，導致這個群體的樣本數量被低估，若將 1983 年（35 歲）或 1993（25 歲）之後的樣本

進行切割，再從第四世代區分出第五世代，又會導致本研究原本第四世代或新切割的第五世代的群體樣本數過少，這也是本研究的限制之一。據此，能更深入的討論網路世代的族群，對於現今政治參與或公民社會發展的詮釋，是有重要意義的，但可能要克服平日面訪時間中，這個群體不易訪到，樣本數量過少的問題，作者目前正在將研究的焦點轉移至大學生為主的年輕群體，希望能延伸本研究的價值，讓本研究推論的廣度可以提高到更新的網路世代。

第四，世代政治在政治學與社會學領域是一個熱門的議題，本研究在世代研究方法的部分，將樣本依照成長期歷經不同政治環境或重大社會事件，切割成四個不同的世代，代表的是經歷不同政治社會化歷程的群體。在操作方法上，以虛擬變數（dummy variable）的方式來處理社會資本與公民意識關聯之中，政治世代的效果，但是這樣的方式仍然略顯粗糙。在世代政治的相關研究中，因為蒐集數據本質的特性，常會有年齡（age）、時期（period），與世代（cohort）等三類變數混淆的困擾，而造成多重共線性的問題。因為這三類變數本質上都是隨時間而改變的連續變數，同時當成自變數進行估計會產生嚴重的統計相關，放大迴歸係數的標準誤，同時降低 APC 變量或整個統計模型的顯著程度（林宗弘，2015）。受限本研究蒐集的是單次橫斷面調查的資料，在世代效果的估計上，可能會難以抽離年齡與時期影響效果的缺陷。為了緩解這些問題，社會科學領域開始引進使用 APC 的分層模型，採用人口學者所發展出來的「交叉分類隨機效應模型」（cross-classified random effects model, CCREM）進行統計分析（Raudenbush & Bryk, 2002; Yang & Land, 2006；林宗弘，2015），但使用 CCREM，需要用同樣的抽樣方法蒐集不同時間點的資料帶入迴歸模型，才能進行世代效果的精確推論，無疑要提高調查的成本，使用大型調查資料庫比較容易做到。建議日後從事相關世代政治的研究者，可以使用這類較為細緻的統計處理方式，更能掌握世代經驗對政治態度與行為影響的效果。

最後，針對本研究的題目設計以及操作概念，僅能從鑲嵌於社會關係中的網絡資源來討論可能對公民意識所產生的影響，指涉的是個人所能觸及的社會資本，也就是社會關係中的位置、狀態的測量，初步地幫助我們理解個人關係資源對於公民意識的影響方向及程度，提供一個更符合臺灣社會脈絡的研究方向與討論的角度。然而，雖然本文透過分析，在控制 Putnam 社會資本（社團參與）的狀況下，驗證了集體性與個人的社會資本與公民意識彼此間的關聯性，但不同層次的社會資本（集體、社群與個人），對臺灣民眾公民態度或公民意識的影響為何？是否有程度

上的落差？影響的機制為何？仍有待後續更進一步的充實與研究。此外，也有研究關注的重點在社會資本的「品質」面向，包含人際網絡中的「信任程度」、「人際互動」、「緊密度」等等，後續的研究如若可以進一步將社會資本測量的內涵進行延伸，相信也更能強化研究的深度。

附錄一 背景與相關變數描述統計

背景與相關變數	類別	人數	百分比 (%)
性別	男性	560	42.1
	女性	767	57.7
	遺漏值	3	0.2
	總計	1330	100
有無伴侶	無伴侶	463	34.8
	有伴侶	824	62.0
	遺漏值	43	3.2
	總計	1330	100
世代	第一代	267	20.1
	第二代	470	35.3
	第三代	311	23.4
	第四代	282	21.2
	總計	1330	100
教育程度	國中及以下	535	40.2
	高級中等學校畢	349	26.2
	大學肄業或專科畢	119	8.9
	大學院校、技術學院畢業	258	19.4
	碩士畢業	47	3.5
	博士畢業	8	0.6
	遺漏值	14	1.1
	總計	1330	100
個人月收入	無收入	194	14.6
	1萬元以下	229	17.2
	1萬-未滿2萬	256	19.2
	2萬-未滿3萬	223	16.8
	3萬-未滿4萬	170	12.8
	4萬-未滿5萬	88	6.6

背景與相關變數	類別	人數	百分比 (%)	
個人月收入	5萬-未滿6萬	66	5.0	
	6萬-未滿7萬	28	2.1	
	7萬-未滿8萬	20	1.5	
	8萬-未滿9萬	8	0.6	
	9萬-未滿10萬	12	0.9	
	10萬-未滿11萬	11	0.8	
	11萬-未滿12萬	1	0.1	
	12萬-未滿13萬	2	0.2	
	13萬-未滿14萬	1	0.1	
	15萬-未滿16萬	1	0.1	
	19萬-未滿20萬	1	0.1	
	20萬-未滿30萬	5	0.4	
	30萬(含)以上	8	0.6	
	遺漏值	6	0.5	
	總計	1330	100	
主觀社會地位	最底層(1)	59	4.4	
	2	42	3.2	
	3	90	6.8	
	4	163	12.3	
	5	517	38.9	
	6	267	20.1	
	7	102	7.7	
	8	51	3.8	
	9	12	.9	
		最頂層(10)	19	1.4
		遺漏值	8	0.6
	總計	1330	100	
社區型態	農村型	521	39.2	
	都市型	809	60.8	
	總計	1330	100	

背景與相關變數	類別	人數	百分比 (%)
每日接觸人數	0人	29	2.2
	1-2人	125	9.4
	3-4人	225	16.9
	5-9人	326	24.5
	10-19人	323	24.3
	20-49人	212	15.9
	50-99人	64	4.8
	100人或以上	24	1.8
	遺漏值	2	0.2
	總計	1330	100
政黨傾向	泛藍	132	9.9
	泛綠	189	14.2
	中立	983	73.9
	遺漏值	26	2.0
	總計	1330	100

附錄二 各變數（含社會人口與政治心理變數）描述 統計摘要表

變項	N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標準差	
參與社團數	1255	0	15	1.75	2.03	
政治興趣	1301	1	4	1.78	0.87	
政治信任	1323	1	5	2.21	0.77	
政治立場	1288	0（左）	10（右）	5.33	2.05	
社會資本	達高度	1222	32	78.16	62.50	14.70
	廣度	1222	1	10	3.76	2.56
	範圍	968	2.64	46.16	30.20	13.62
公民意識	1321	1	5	3.14	0.89	

參考文獻

- 包正豪（2009）。臺灣地區民眾領袖情結的世代差異。《選舉評論》，（7），45-68。
Pao, Cheng-Hao (2009). Taiwan di qu min zhong ling xiu qing kie de shi dai cha yi [The diversity of the leadership complex in terms of political generation]. *The Journal of Election Review*, (7), 45-68.
- 李宗榮（2012）。探索風險投資的社會機制：社會資本與股市、共同基金的參與。《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24（4），439-467。Li, Zong-Rong (2012). Tan suo feng xian tou zi de she hui ji zhi: She hui zi ben yu gu shi, gong tong ji jinde tsan yu [Exploring social mechanisms behind risky financial investments: Social capital and participation in stock markets and mutual funds].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and Philosophy*, 24(4), 439-467.
- 周憐嫻（2014）。偏差與犯罪。載於王振寰、瞿海源（編），《社會學與臺灣社會（第四版）》（89-117頁）。臺北：巨流。Jou, Su-Syan (2014). Pian cha yu fan zui [Deviation and crime]. In Wang, Jenn-Hwan & Chiu, Hei-Yuan (Ed.). *She hui xue yu Taiwan she hui (di si ban)* [*Sociology and Taiwan4th*]. (pp. 89-117). Taipei: Chuliu Press.
- 林火旺（1998）。公民身分：認同和差異。載於蕭高彥、蘇文流（編），《多元主義》（379-409頁）。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Lin, Huo-Wang (1998). Gong min shen fen ren tong he cha yi [Citizenship identity and difference]. In Shaw, Carl K. Y. & Su, Wen-Liu (Ed.). *Duo yuan zhu yi* [*Cultural pluralism*]. (pp. 379-409). Taipei: Research Center for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Press.
- 林宗弘（2015）。再探臺灣的世代政治：交叉分類隨機效應模型的應用，1995-2010。《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27（2），395-436。Lin, Thung-Hong (2015). Zai tan Taiwan de shi dai zheng zhi: Jiao cha fen lei sui ji xiao ying mo xing de ying yong, 1995-2010 [Generational politics in Taiwan revisited: Application of a cross-classified random effects model, 1995-2010].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and Philosophy*, 27(2), 395-436.
- 林信志（2016）。公民意識類型的世代差異：以典範公民面向分析。國立成功大學政治經濟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南。Lin, Sin-Chih (2016). *Gong min yi shi lei xing de shi dai cha yi: yi dian fan gong min mian*

- xiang fen xi [Generation gap in typology of citizenship: The ideal citizen perspective analysis]*. Unpublished master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Economy,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Tainan.
- 林南 (2005)。社會資本，林祐聖、葉欣怡 (譯)，臺北：弘智文化。譯自 Social capital. A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action. Nan Lin, 2001. Lin, Nan (2005). *She hui zi ben*, Lin, Yu-Sheng, Yeh, Hsin-Yi trans. Taipei: Hongzhi Publisher. Translated from Social capital. A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action. 2001.
- 林南、陳志柔、傅仰止 (2010)。社會關係的類型和效應：臺灣、美國、中國大陸的三地比較。臺灣社會學刊，(45)，117-162。Lin, Nan, Chen, Chih-Jou Jay & Fu, Yang-Chih (2010). She hui guan xi de lei xing he xiao ying: Taiwan mei guo zhong guo da lu de san di bi jiao [Patterns and effects of social relations: A comparison of Taiwa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aiwa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45), 117-162.
- 林珮婷 (2014)。男女有別？社會資本使用於政治場域的類型初探。選舉研究，21 (2)，81-112。Lin, Pei-Ting (2014), Nan nyu you bie she hui zih ben shih yong yu jheng jhih chang yu de lei sing chu tan [Gender difference?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typology of utilization of social capital in politics]. *Journal of Electoral Studies*, 21(2), 81-112.
- 林聰吉、楊湘齡 (2008)。臺灣社會資本的分佈及其民主效果。東吳政治學報，26 (2)，39-83。Lin, Tsong-Jyi & Yang, Xing-Ling (2008). Taiwan she hui zi ben de fen bu ji qi min zhu xiao guo [Effects of social capital on the Taiwanese democracy]. *Soochow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6(2), 39-83
- 林瓊珠 (2016)。公民意識與政治參與。民主與治理，3 (2)，1-21。Lin, Chiung-Chu (2016). Gong min yi shih yu jheng jhih can yu [Citizen consciousness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Journal of Democracy and Governance*, 3(2), 1-21.
- 俞振華、翁定暉 (2017)。影響台灣民眾政治參與的因素：從公民規範認知的觀點出發。調查研究－方法與應用，(38)，9-56。Yu, Eric Chen-Hua & Weng, Ting-Wei (2017). Ying siang Taiwan min jhong jheng jhih can yu de yin su: cong gong min guei fan ren jhih de guan dian chu fa [Determinants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Taiwan: From a viewpoint of citizenship norms]. *Survey Research - Method and Application*, (38), 9-56.
- 徐明莉、莊文忠 (2020)。臺灣民眾的公民意識與公民參與。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32 (3)，333-366。Hsu, Ming-Li & Juang, Wen-Jong (2020). Taiwan min jhong de gong min yi shih yu gong min can yu [Citizen consciousness and

- citizen participation in Taiw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and Philosophy*, 32(3), 333-366.
- 崔曉倩、吳重禮（2011）。年齡與選舉參與：2008年總統選舉的實證分析。調查研究—方法與應用，（26），7-44。Tsui, Hsiao-Chien & Wu Chung-Li (2011). Nian ling yu syuan jyu can yu: 2008 nian zong tong syuan jyu de shih jheng fen si [Age and electoral participation: The 2008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Taiwan]. *Survey Research - Method and Application*, (26), 7-44.
- 張芳華（2016）。制度變遷、社會資本、政治參與，三者之間的關係。臺北：政大出版社。Chang, Fang-Hua (2006). *Zhi du bian qian she hui zi ben zheng zhi can yu san zhe zhi jian de guan xi [Institutional change, Social capital,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hree]*. Taipei: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Press.
- 盛杏媛（2010）。台灣選民政黨認同的穩定與變遷：定群追蹤資料的運用。選舉研究，17（22），1-33。Sheng, Shing-Yuan (2010). Taiwan xuan min zheng dang ren tong de wen ding yu bian qian: ding qun zhui zong zi liao de yun yong [Stability and change of party identification among Taiwanese voters: A panel data analysis]. *Journal of Electoral Studies*, 17(22), 1-33.
- 盛杏媛（2013）。第十六章：政治參與。載於陳義彥（主編），政治學（第四版）（415-441頁）。臺北：五南出版社。Sheng, Shing-Yuan (2013). Di shi liu zhang: zheng zhi can yu [Chapter 16: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Chen, Yih-Yan (Ed.), *zheng zhi xue (di si ban)* [Politics 4th] (pp. 415-441). Taipei: Wu-Nan Press.
- 莊文忠（2010）。臺灣民眾公民意識的變化：2008年政權二次輪替前後的比較分析。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22（2），201-246。Juang, Wen-Jong (2010). Taiwan min zhong gong min yi shi de bian hua: 2008 nian zheng quan er ci lun ti qian hou de bi jiao fen xi [What change of citizenship? Difference between before and after the second party alternation in Taiw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and Philosophy*, 22(2), 201-246.
- 許文傑（2000）。公民參與公共行政之理論與實踐—「公民性政府」的理想型建構。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博士論文，未出版，臺北。Hsu, Wen-Chieh (2000). *Gong min can yu gong gong xing zheng zhi li lun yu shi jian-「gong min xing zheng fu」de li xiang xing jian gou [Theories and practices of citizen participating public administration: Constructing an ideal type of*

- citizenship-government*].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pei.
- 郭秋永 (2009)。公民意識：實證與規範之間的一個整合研究。載於張福建（主編），*公民與政治行動：實證與規範之間的對話*（41-94 頁）。臺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和政治思想研究專題中心。Kuo, Chiu-Yeung (2009). Gong min yi shi: shi zheng yu gui fan zhi jian de yi ge zheng he yan jiu [Citizenship: An integrative study between empirical and normative]. Chang, Fu-Kien (Ed.), *Civic and Political Action: A Dialogue Between Evidence and Norms* (pp. 41-94). Taipei: The center for Political Thought, RCHSS, Academia Sinica Press.
- 陳文俊 (2003)。藍與綠：臺灣選民的政治意識形態初探。*選舉研究*，10（1），41-80。Chen, Wen-Chun (2003). Lan yu lyu: Taiwan syuan min de jheng jihih yi shih sing tai chu tan [The Blue and the Green - The political ideologies of the mass public in the 2000 Taiwan presidential election]. *Journal of Electoral Studies*, 10(1), 41-80.
- 陳光輝 (2010)。台灣民眾的公民意識、藍綠政治支持與公民投票態度之關聯性。*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22（2），247-274。Chen, Kuang-Hui (2010). Taiwan min zhong de gong min yi shi lan lyu zheng zhi zhi chi yu gong min tou piao tai du zhi guan lian xing [The public's citizenship, Blue-Green partisanship, and attitudes toward referendum in Taiw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and Philosophy*, 22(2), 247-274.
- 陳其南 (1992)。公民國家意識與臺灣政治發展。臺北：允晨文化。Chen, Chi-Nan (1992). *Gong min guo jia yi shi yu Taiwan zheng zhi fa zhan [Citizen's national consciousness and Taiwan's political development]*. Taipei: Asian Culture Press.
- 陳陸輝 (2000)。臺灣選民政黨認同的持續與變遷。*選舉研究*，7（2），109-141。Chen, Lu-Huei (2000). Taiwan xuan min zheng dang ren tong de chi xu yu bian qian [Change and continuity of party identification among the electorate in Taiwan]. *Journal of Electoral Studies*, 7(2), 109-141.
- 陳陸輝 (2010)。政治文化與政治社會化。載於陳義彥（主編），*政治學*（331-352 頁）。臺北市：五南圖書公司。Chen, Lu-Huei (2010). Zheng zhi wen hua yu zheng zhi she hui hua [Political culture and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Chen, Yih-Yan (Ed.), *zheng zhi xue [Politics]* (pp. 331-352). Taipei: Wu-Nan Press.
- 傅仰止 (2014)。公民意識的社會參與效應：志願結社及日常接觸。*臺灣社會學*

- 刊，(55)，179-226。Fu, Yang-Chih (2014). Gong min yi shi de she hui can yu xiao ying: zhi yuanjie shejiri changjie chu [Social participation effects on civic consciousness: Voluntary associations and daily contacts]. *Taiwa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55), 179-226.
- 傅仰止、張心潔 (2014)。性別化的社會資本與配偶網絡。《社會科學論叢》，8 (2)，125-165。Fu, Yang-Chih & Chang, Hsin-Chieh (2014). Xing bie hua de she hui zi ben yu pei ou wang luo [Gender differences in social capital and spousal networks]. *Review of Social Sciences*, 8(2), 125-165.
- 游欣儀 (2004)。臺北市社區大學學員公民意識、公民參與行為及其影響因素之研究。國立中山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高雄。Yu, Hsin-Yi (2004). Tai bei shi she qu da xue xue yuan gong min yi shi gong min can yu xing wei ji qi ying xiang yin su zhi yan jiu [The study of civic consciousness, Citizen participation and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of students of Taipei's community universities]. Unpublished master dissertation, Institute of Education,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Kaohsiung.
- 黃靖麟 (2010)。公民意識、文官印象與選民行為：以 2009 年雲林縣長、桃園縣長比較分析為例。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 2010 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Huang, Jin-Lin (2010). *Gong min yi shi wen guan yin xiang yu xuan min xing wei: yi 2009 nian yun lin xian chang tao yuan xian chang bi jiao fen xi wei li* [Civic awareness, Civil service impression and voter behavior: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Yunlin county governor and Taoyuan county governor in 2009 as an exampl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10 Taiwan's Elec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Studies, Taipei.
- 楊婉瑩 (2007)。政治參與的性別差異。《選舉研究》，14 (2)，53-94。Yang, Wang-Ying (2007). zheng zhi can yu de xing bie cha yi [The gender differences i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Journal of Electoral Studies*, 14(2), 53-94.
- 楊貴、陳韻暄 (2020)。公民意識對臺灣民衆政治參與之影響：2012 與 2018 兩個年度的觀察。《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32 (3)，367-410。Yang, Gui & Chen, Yun-Hsuan (2020). Gong min yi shi dui Taiwan min zheng zhi can yu zhi ying xiang: 2012 yu 2018 liang ge nian du de guan cha [The impact of citizenship o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mong Taiwan's public: Evidence from two citizenship surveys in 2012 and 2018].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and Philosophy*, 32(3), 367-410.
- 熊瑞梅 (2014)。社會資本與信任：東亞社會資本調查的反思。《臺灣社會學刊》，

- (54), 1-30。Hsung Ray-May (2014), She hui zi ben yu xin ren: Dong ya she hui zi ben diao cha de fan si [Social capital and trust: Reflections on data from the East Asia Social Capital Survey]. *Taiwa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54), 1-30.
- 蕭揚基 (2000)。臺灣中部地區高中生公民意識及相關因素之研究。國科會研究計畫 (編號: NSC 89-2413-H-212-003-S)。臺北: 國科會。Shiau, Young-Key (2000). *Taiwan zhong bu di qu gao Zhong sheng gong min yi shi ji xiang guan yin su zhi yan jiu* [A study of civil awareness of senior high students in central Taiwan and relevant factors].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Research Project. (Project number: NSC 89-2413-H-212-003-S). Taipei: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 蕭揚基 (2004)。形塑現代公民: 高中學生公民意識發展與培育之研究。新北: 韋伯。Shiau, Young-Key (2004). *Xing su xian dai gong min: gao Zhong xue sheng gong min yi shi fa zhan yu pei yu zhi yan jiu* [Shaping modern citizens: A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and cultivation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citizenship]. New Taipei: Weber Press.
- 謝秉錡 (2011)。個人社會資本與公民態度關係之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碩士論文, 未出版, 臺北。Hsieh, Ping-Chi (2011). *ge ren she hui zi ben yu gong min tai du guan xi zhi yan jiu* [The study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vidual social capital and civic attitude]. Unpublished master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Civic Education and Leadership,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pei.
- 顧忠華 (2004)。從社會資本理論探討臺灣第三部門之發展問題。(國科會研究計畫 NSC 92-2412-H-004-009)。臺北: 國科會。Ku, Chung-Hwa (2004). *Cong she huizi ben li lun tan tao Taiwan di san bu men zhi fa zhan wen ti* [Probing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s third sector from the theory of social capital].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Research Project. (Project number: NSC 92-2412-H-004-009). Taipei: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 Astone, N. M., C. A. Nathanson, R. Schoen, & Y. J. Kim (1999). Family demography, social theory, and investment in social capital.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5(1), 1-31.
- Bloemraad, I. (2018). Theorising the power of citizenship as claims-making.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44(1), 4-26.

- Bourdieu, P. (1980). Le capital social: Notes provisoires. *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 31, 2-3.
- Bourdieu, P. (1986). The Forms of Capital. In John G. Richardson (ed.),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pp. 241-258). New York, NY: Greenwood Press.
- Bourdieu, P. (1993). *Sociology in question*. London, England: Sage.
- Bourdieu, P. (1997). The forms of capital. In A. H. Halsey, H. Launder, P. Brown, & S. A. Wells (Eds.), *Education: Culture, economy and society* (pp. 46-58). Oxford, Engl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urt, R. S. (1992). *Structural holes: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competi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Campbell, A., P. E. Converse, W. E. Miller, & D. E. Stokes (1960). *The American voter*. Chicago, I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oleman, J. S. (1988).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 95-120.
- Coleman, J. S. (1990).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Cramer, K. J. (2016). *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 Rural consciousness in Wisconsin and the rise of Scott Walker*.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Dahl, R. A. (2006). *On political equality*.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Delli, C., X. Michael, & S. Keeter (1996). *What Americans know about politics and why it matter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Doheny, S. (2007). Responsibility and the deliberative citizen: Theorizing the acceptance of individual and citizenship responsibilities. *Citizenship Studies*, 11(1), 405-420.
- Dostie-Goulet, E. (2009). Social network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interest. *Journal of Youth Studies*, 12(4), 405-421.
- Erickson, B. H. (1995, February). *Networks, Success, and Class Structure: A Total View*. Sunbelt Social Networks Conference. Charleston, S. C.
- Erickson, B. H. (1996). Culture, Class and Connec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2(1), 217-251.
- Fischer, C. S. (1982). *To dwell among friends: Personal networks in town and c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Fischer, C. S., & Y. Shavit (1995). National differences in network density: Israel and the United States. *Social Networks*, 17(2), 129-145.

- Flap, H. D. (1991). Social capital in the reproduction of inequality. *Comparative Sociology of Family, Health and Education*, 20, 6179-6202.
- Flap, H. D. (1994). *No man Is an island: The research program of a social capital theory*. World Congress of Sociology. Bielefeld, Germany.
- Foschi, R., & M. Lauriola (2014). Does sociability predict civic involvement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6(2), 339-357.
- Galston, W. A. (2001). Political knowledge, Political engagement, and civic education.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4, 217-234.
- Gastil, J., & J. P. Dillard (1999). Increasing political sophistication through public deliberatio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16(1), 3-23.
- Homans, G. C. (1961). *Social behavior: Its elementary form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 Hooghe, M., & S. Marien (2013).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political trust and forms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Europe. *European Societies*, 15(1), 131-152.
- Isin, E. F., & B. S. Turner (2002). *Handbook of Citizenship Studies*. London: Sage.
- Isin, E. F., & B. S. Turner (2007). Investigating citizenship: An agenda for citizenship studies. *Citizenship Studies*, 11(1), 5-17.
- Jennings, M. K., & R. G. Niemi (1981). *Generations and politics: A panel study of young adults and their parent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Kingston, P. W., & S. E. Finkel (1987). Is there a marriage gap in politic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49(1), 57-64.
- Kotler-Berkowitz, L. (2005). Friends and politics: Linking diverse friendship networks to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Alan S. Zuckerman (ed.), *The social logic of politics: Personal networks as contexts for political behavior* (pp. 152-170).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Kymlicka, W., & W. Norman (1994). Return of the citizen: A survey of recent work on citizenship theor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04(2), 352-381.
- Lai, G., N. Lin, & Shu-Yin Leung (1998). Network resources, contact resources, and status attainment. *Social Networks*, 20(2), 159-178.
- Laumann, E. O. (1973). *Bonds of pluralism: The forms and substance of urban social networks*. New York: Wiley.
- Lin, N. (1982). Social resources and instrumental action. In P. V. Marsden, & N. Lin (Eds.), *Social structure and network analysis* (pp. 131-145). Beverly Hills, CA: Sage.
- Lin, N., & M. Dumin (1986). Access to occupations through social ties. *Social Networks*,

8(4), 365-385.

- Lin, N. (1995). Les ressources sociales: Une Théorie du capital social. *Revue française de sociologie*, 36(4), 685-704.
- Lin, N. (1999). Social networks and status attainment.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5, 467-487.
- Lin, N. (2001a). *Social capital: A theory of structure and ac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in, N. (2001b). Building a network theory of social capital. In N. Lin, K. Cook, & R. S. Burt (Eds.), *Social capital: Theory and research* (pp. 3-29).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 Lin, N., Yang-chih Fu, & Ray-May Hsung (2001). Position generator: Measurement techniques for investigations of social capital. In N. Lin, K. Cook, & R. S. Burt (Eds.), *Social capital: Theory and research* (pp. 57-81).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 Lin, N. (2008). A network theory of social capital. In D. Castiglione, J. W. van Deth, & G. Wolleb (Eds.), *Handbook of social capital* (pp. 50-59).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in, N., & B. H. Erickson (2008). Theory, measurement, and the research enterprise on social capital. In N. Lin, & B. H. Erickson (Eds.), *Social capital: A international research program* (pp. 1-24).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yons, J., & S. M. Utych (2021). You're not from Here! The consequences of urban and rural identities. *Political Behavior*, 18, 1-27.
- Macfoy, M. K. (2014). Introduction: Who is a citizen? Feminism, multiculturalism and immigration. In R. Bellamy, & M. K. Macfoy (Eds.), *Citizenship* (Vol II)(pp.161-371). New York: Routledge.
- Martin, I., & J.W. Van Deth (2007). Political involvement. In J. W. van Deth, J. R. Montero, & A. Westholm (Eds.), *Citizenship and involvement in European democraci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pp. 303-333). London: Routledge.
- Meltzer, A. H., & S. F. Richard (1981). A rational theory of the size of government.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9(5), 914.
- Milbrath, L. W., & M. L. Goel (1977).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How and why do people get involved in politics?* Chicago: Rand McNally.
- Milgram, S. (1970). The experience of living in cities. *Science*, 167(3924), 1461-1468.
- Nie, N. H., J. Junn, & K. Stehlik-Barry (1996). *Education and citizenship in America*.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Nilson, D. C., & L. B. Nilson (1980). Trust in elites and protest orientation: An integrative approach. *Political Behavior*, 2(4), 385-404.
- Norris, P. (2002). *Democratic phoenix: Reinventing political activ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attie, C., P. Seyd, & P. Whiteley (2004). *Citizenship in Britain: Values, participation and democracy*.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axton, P. (2002). Social capital and democracy: An interdependent relationship.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7(2), 254-277.
- Persson, M. (2011). An empirical test of the relative education model in Sweden. *Political Behavior*, 33(3), 455-478.
- Portes, A. (1998). Social capital: Its origins and applications in modern sociolog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4, 1-24.
- Putnam, R. D. (1993).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Putnam, R. D. (1995). Bowling alone: American's declining social capital. *Journal of Democracy*, 61, 65-78.
- Putnam, R. D. (2000).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 Raudenbush, S.W., & A. S. Bryk (2002).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s: Applications and data analysis methods* (2nd ed.).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Inc.
- Reynolds, H. T. (1974). *Politics and the common man: A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behavior*. Homewood, IL: Dorsey Press.
- Ripperger, T. (1998). *Ökonomik des Vertrauens: Analyse eines organisationsprinzip*. Tübingen, Germany: Mohr Siebeck.
- Rojas, H., D. V. Shah, J. Cho, M. Schmierbach, H. Keum, & H. Gil de Zúñiga (2005). Media dialogue: Perceiving and addressing community problems. *Mass Communication & Society*, 8, 93-110.
- Rosenstone, S. J., & J. M. Hansen (1993). *Mobilization, participation, and democracy in America*. New York: Macmillan.
- Rosenstone, S. J., & J. M. Hansen (2003). *Mobilization, participation, and democracy in America*. New York: Longman.
- Saunders, K. L., & A. I. Abramowitz (2004). Ideological realignment and active partisans in the American electorate. *American Politics Research*, 32(3), 285-309.
- Simmel, G. (2012). The metropolis and mental life. In J. Lin, & C. Mele (Eds.), *The urban sociology reader* (pp. 23-31). New York, NY: Routledge.

- Smith, E. S. (1999). The effects of investments in the social capital of youth on political and civic behavior in young adulthood: A longitudinal analysis. *Political Psychology*, *20*(3), 553-580.
- Song, L., & N. Lin (2009). Social capital and health inequality: Evidence from Taiwan.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50*(2), 149-163.
- Stokke, K. (2017). Politics of citizenship: Toward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Norsk Geografisk Tidsskrift - Norwegian Journal of Geography*, *71*(4), 193-207.
- van der Gaag, M., & Tom A. B. Snijders (2004). Proposals for the measurement of individual social capital. In H. Flap, & B. Völker (Eds.), *Creation and Returns of Social Capital* (pp. 199-218). London: Routledge.
- van der Gaag, M., Tom A. B. Snijders, & H. Flap (2008). Position generator measure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to other social capital measures. In N. Lin, & B. H. Erickson (Eds.), *Social capital* (pp. 27-48).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van der Heijden, Hein-Anton (2014). *Handbook of political citizenship and social movements*.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 van Deth, J. W. (1989). Interest in politics. In S. H. Barnes, J. W. van Deth, & M. K. Jennings (eds.), *Continuities in political action: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political orientations in three western democracies* (pp. 275-312). New York, NJ: Walter de Gruyter.
- van Deth, J. W., & M. Elff (2004). Politicisa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interest in Europe.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43*(3), 477-508.
- Verba, S., & N. H. Nie (1972). *Participation in America: Political democracy and social equalit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Verba, S., K. L. Schlozman, & H. E. Brady (1995). *Voice and equality: Civic voluntarism in American politic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Vrablikova, K., & Jan W. van Deth (2017). Conducive contexts: The impact of collective and individual social capital on democratic citizenship. *Acta Politica*, *52*, 23-42.
- Wang, Ching-hsing, & Dennis Lu-chung Weng (2017). The Effects of Civic Consciousness and Civil Disobedience on Support for and Participation in Contentious Politics. *Jap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8*(2), 313-335.
- Yang, Y., & K. C. Land (2006). A mixed models approach to the age-period-cohort analysis of repeated cross-section surveys, with an application to data on trends in verbal test scores. *Sociological Methodology*, *36*(1), 75-97.

Social Capital and Public Citizenship: Comparing Generation Differences

Guang-Xu Wang*, Tzu-Hung Tsai**

Abstract

The present research aim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vidual social capital and citizenship and also the difference between different political generations. This research reveals how social capital differs between western and eastern societies, and also helps to understand the impact of social capital on citizenship in Chinese society. The findings show that: (1) individual social capital has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impact on public citizenship; (2) the social capital and citizenship of the first generation are lower than that of other generations; (3) the fourth generation pervasively has a higher level of citizenship, yet under the condition of high social capital, the citizenship of the first generation is on a higher level. This research demonstrates a distinct interpretation based on a personal network perspective of social capital different from Putnam's, on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itizenship. Hopefully, the research can help build a new direction for research ideas in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citizenship in Taiwan.

Keywords: citizenship, social capital, position generator, social network, 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Management,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ainan, e-mail: gxwang@gm2.nutn.edu.tw.

** Master Student, Departmen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e-mail: 108256002@nccu.edu.tw.